

再見列寧：消費東德與新德國國族認同危機*

潘宗億 **

本文以「文化記憶」與「空間的生產」等學理為研究取徑，檢視電影《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及其所再現之「懷舊東德」(Ostalgie)風潮的多重意義，嘗試從中釐清兩德統一之後德東人「懷舊東德」情結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脈絡，探析其以消費東德商品作為社群認同建構形式的「文化記憶」基礎。首先，在解析《再見列寧》歷史性的基礎上，本文之論述具體展示《再見列寧》乃一探究社群記憶和認同建構之社會性、儀式性、物質性與空間性的絕佳個案。其次，本文進一步剖析「懷舊東德」與《再見列寧》如何得以形成寄託「懷舊東德」情結的「文化記憶」媒介，成為德東人在德國人與東德人認同之外，建構第三種社群認同模式的社會性空間。再者，本文具體歸納兩德統一之後形成「懷舊東德」情結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因素，從中論證「懷舊東德」商品化，乃緣於新德國建立過程中「去東德化」統一政策與選擇性國史書寫暴力，導致德東人構成「沒有離開家卻已經移

* 在此特別感謝匿名審查者所提供的寶貴修改意見，使本文的論證得以更臻完善。此外，本文寫作期間曾獲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歷史與記憶」課程學生之批評與指教，並曾於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第十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兩岸史學的研究與對話」發表時獲蕭道中教授之指正與修改意見，一併致上謝意。本文如有任何缺失，由本人負責。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聯絡方式：97401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1號(No. 1, Sec. 2, University Road, Shoufeng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97401, Taiwan [R.O.C.])。

民」的「二等公民」自我認同、歷史情感之傷與國族認同差異危機的結果。最後，本文再進一步論證「懷舊東德」現象的物質文化基礎，及其所涉之社群記憶與遺忘政治。

本文針對《再見列寧》學理與歷史意義的多層次討論，提供一個從事歷史影片歷史性分析的新研究取徑，期對臺灣影視、應用史學的研究與教學，有所建樹。再者，運用「文化記憶」分析概念檢視《再見列寧》與「懷舊東德」現象，涉及懷舊商品化或人類社群消費特定「過去」之商業面向的關注，期對臺灣歷史學界從經濟視角從事歷史記憶的研究與學理探討，有所貢獻。

關鍵詞：再見列寧、懷舊東德、國族認同、文化記憶、
空間的生產

一、前言

2014年夏天，德國足球國家隊睽違24年，繼1990年之後，再度奪得世界盃冠軍，德國人民燃起一股「我們都是世界冠軍」(Wir sind alle Weltmeister)¹的國族情緒。兩次世界盃，結果相同，但意義卻大不相同。1990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或西德)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或東德)，正經歷「轉折」(Die Wende)之際，雖以「西德」之名奪得世足冠軍，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上空絢爛煙火，引起不分東、西德人民的共鳴，成為迎接10月3日兩德統一最具象徵意義的賀禮。2014年，德國人終於見證兩德統一後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家隊，取得大力神盃(World Cup Trophy)，並齊聚在從布蘭登堡門綿延至勝利紀念柱(Siegestsäule)的百萬球迷大道(fan miles)，共享國家光榮，誠如一位德東婦女所言：「我們的國家贏得世界盃，這是『統一』後的第一次，是我們的國家！」²

歡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奪得1990年世足冠軍的燦爛煙火，也出現在影片《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 2003; GBL)中。³在這部以「轉折」為歷史背景，描寫東德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影片中，東、西德人在1990年世足賽期間，如生命共同體般在電視機前一起為他們認同的「國家隊」歡欣鼓舞。時雖尚未正式統一，兩德人民卻已浸淫在迎接統一的歡樂之中，並隨世足冠軍的喜悅，達到高潮，正如影片主人翁亞力士(Alex Kerner)的感嘆：「一

¹ 2014年7月15日德國足球國家隊獲得世界盃足球賽冠軍之後凱旋，出席柏林的奪冠慶祝活動，接受百萬球迷熱烈歡迎，而當時的德國足球隊總教練勒夫(Joachim Löw)接受媒體訪問時即表示：「我們都是世界冠軍。」這裡的「我們」，指的是全德國人。參閱 http://www.welt.de/newsticker/dpa_nt/infoline_nt/sport_nt/article130174413/Wir-sind-alle-Weltmeister.html, accessed July 17, 2014.

² 根據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陳祐蕙於2014年7月15日在布蘭登堡門附近的訪談記錄。其次，本文稱併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東德五邦地區為德東，前東德公民為德東人，稱統一後的原西德地區為德西，前西德公民為德西人，特此說明。

³ Wolfgang Becker, dir., Good Bye, Lenin! (Berlin: Sony Pictures, 2002). 本文使用臺灣雷公電影公司所發行的DVD《再見列寧》作為文本解讀與詮釋的基礎。

個小球(足球)使這個分裂國家的社會合而為一，也讓『本是同根生』的東、西(德)再度一起成長。」(GBL, 50:42)⁴亞力士的感嘆，雖與前西德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 1913-1992)在紀念兩德邊界開放與柏林圍牆倒塌的演講中所稱「本是同根生，成長難分離(Jetzt wächst zusammen, was zusammengehört)」⁵符合若節，卻不能就此認為，《再見列寧》僅複製了德國「轉折」以來樂觀的統一政策與選擇性國史論述。本文即嘗試論證，《再見列寧》以多元視角，同時呈現了兩德統一以來至21世紀初新德國族認同建構的危機狀態，以及追求內在統一性的樂觀展望，並進一步探究，在西德主宰性統一政策與選擇性國史書寫之宏觀脈絡下，德東人何以自認為「二等公民」的國族認同困境，又如何得以企圖藉由重構或消費「過去」東德商品與意象，在「現在」統一的新德國，形塑其身份認同。整體而言，本文之析論，具體展現《再見列寧》透過東德小人物日常生活之演繹，不但呈現兩德統一歷程，反映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的危機狀態，其本身也成為懷舊東德商品化的「文化記憶」媒介。

《再見列寧》由德西導演貝克(Wolfgang Becker, 1954-)⁶執導，於2003年2月正式上映之後，獲得廣泛性成功，甚至擊敗好萊塢大片，成為德國年度暢銷影片。上映一年內，該片獲得德西與德東觀眾之共鳴，觀影人數達6,439,777人，超過《蘿拉快跑》(Lola rennt, 1998)、《日光大道》(Sonnenallee, 1999)

⁴ 意指所引台詞出現在影片50分42秒左右，特此說明，以下不再重複。

⁵ 在同一個紀念柏林圍牆形同倒塌的集會演講當中，當時的西德總理柯爾(Helmut Kohl, b. 1930)也表現出類似的提法：「我們仍然是一個民族，彼此相屬。」參見Willy Brandt, "Speeches at the Schöneberg City Hall in West Berlin," in Richard T. Gray and Sabine Wilke, ed. *German Unific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62, 66; Yorke M. Rowan and Uzi Baram, ed. *Marketing Heritage: Archaeolog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ast* (California: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2004), 153-154.

⁶ 貝克於1954年出生於西德西伐利亞(Westphalia)的黑墨市(Hemer)，曾在1974至1979年間於柏林自由大學學習歷史、德國研究與美國研究，隨後於1980至1986年間於柏林德國電影與電視學院(Deutsche Film- und Fernsehakademie Berlin, dffb)學習電影製作，其畢業作品《蝴蝶》(Schmetterlinge)曾獲學生奧斯卡等獎項之肯定。參閱"Wolfgang Becker: Portrait" <http://www.kino.de/star/wolfgang-becker/89826>, accessed on April 19, 2003; Mary-Elizabeth O'Brien, *Post-Wall German Cinema and 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12), 63.

和《何處是我家》(*Nirgendwo in Afrika*, 2001)，並席捲全球，創下近8,000萬美元票房，在德國與歐美影展屢創佳績。⁷

為何由一位德西導演所拍攝的《再見列寧》，得以引起不分德東與德西社群的共鳴，票房表現如此亮眼？《再見列寧》的劇組成員，由德西製片、編導、攝製等幕後工作人員，以及德東人為主的演員群所組成。作為靈魂人物的編劇利希騰伯格(Bernd Lichtenberg)與導演貝克，均生長於西德，缺乏東德日常生活經驗。在演員陣容上，除男主角布爾(Daniel Brühl, 1978)之外，包括女主角薩斯(Katrin Saß)在內，主要以德東演員為主。⁸雖然《再見列寧》在德國獲得廣泛接受，但輿論界仍出現負評，尤其質疑導演與編劇都生長於「西德」，何以有資格拍攝一部闡述「東德」市井生活故事的電影？⁹針

⁷ 《再見列寧》一片曾獲歐美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劇本等其他技術獎項，例如德國電影獎(Deutscher Filmpreis)與歐洲電影獎(European Film Awards)最佳影片、倫敦影評人協會(London Film Critics' Circle)最佳外語片，以及與凱薩獎(César Award)、哥雅獎(Goya Awards)最佳歐洲影片等。Daphne Berdahl, "Goodbye Lenin, Aufwiedersehen GDR: On the Social Life of Socialism," in Daphne Berdahl, *On the Social Life of Postsocialism*, Martin Bunzi,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6;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From Colonization to Nostalgia* (New York: Berg, 2005), 129; 《再見列寧》票房統計數字，參見「德國聯邦電影局」(Filmförderungsanstalt)官方網站 <http://www.ffa.de>; "Good Bye Lenin! sweeps Europe Film Awards," accessed July 17, 2014; <http://www.smh.com.au/articles/2003/12/07/1070732064859.html>, accessed July 17, 2014; "Good Bye Lenin! Jetzt, iM KiNO," <http://www.79qmdr.de/index2.php>, accessed July 17, 2014.

⁸ 《再見列寧》的幕後製作團隊方面，製片是阿恩特(Stefan Arndt, 1961-)生長於慕尼黑(Munich)，與貝克同為X Filme Creative Pool電影製作公司合夥人；編劇利希騰伯格(Bernd Lichtenberg, 1966-)於1966年出生於萊沃庫森(Leverkusen)；攝影庫庫拉(Martin Kukula, 1957-2013)於1957年出生於威斯巴登(Wiesbaden)。主要演員方面，飾演亞力士的男主角布爾於1978年出生於巴塞隆那(Barcelona)，後隨父母遷居西德科隆(Cologne)；飾演克莉絲汀(Christiane Kerner)的女主角薩斯則於1958年出生於什未林(Schwerin)，成長於東德時期；飾演亞麗雅娜(Ariane Kerner)的西蒙(Maria Simon, 1976-)出生於萊比錫(Leipzig)；飾演亞麗雅娜男友韓納(Rainer)的貝葉爾(Alexander Beyer, 1973)出生於埃爾福特(Erfurt)；飾演亞力士工作夥伴丹尼斯(Denis)的盧卡斯(Florian Lucas, 1973-)出生於東柏林。換言之，除了男主角布爾，主要演員皆為德東人，其他飾演年紀較長的演員也都是德東人為主。

⁹ Anke Westphal, "Was unterging, taucht nicht mehr auf: Good bye, Lenin! von Wolfgang Becker legt heiter Distanz ein—das macht traurig," *Berliner Zeitung*, 8 Feb. 2003, <http://www.berliner-zeitung.de/archiv/-good-bye--lenin---von-wolfgang-becker-legt-heit-er-distanz-ein---das-macht-traurig-was-unterging--taucht-nicht-mehr-auf,10810590,1006>

對此，貝克反駁，德西身份反而賦其適當的闡釋「距離」，使他能夠創作一部引起德東人共鳴的影片。他還笑稱，相較於拍攝一個有關十八世紀女性的電影，拍攝東德的故事反而較為容易。¹⁰貝克的觀點，也獲得當時部分評論者的認同，甚至稱德東導演未必可以做得更好。¹¹

除了社群「距離」的優勢之外，時間「距離」或是《再見列寧》在德國獲得成功的另一個因素。面對媒體訪談時，編導與男主角均強調時間「距離」的重要性。編劇表示，《再見列寧》的創作靈感，在他於1990春天起旅居東柏林期間已經出現，但卻因時機仍不成熟，而將劇本大綱深鎖於抽屜之中。¹²導演也強調，十年的「時間」距離，讓這部電影能夠以幽默手法，講述東德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並且讓德東觀眾可以笑看影片，回憶社會主義時光；男主角布爾與女主角薩斯，也表達同樣觀點。¹³因此，社群身份與時間的雙重「距離」，或是《再見列寧》一片深獲德東觀眾喜愛的因素之一。

《再見列寧》之叫好叫座，也與編導下功夫從事歷史研究有密切關係。編劇與導演在電影籌備期間積極研究東德歷史，檢視許多檔案資料與紀錄

3318.html, accessed on April 16, 2015; 相關討論參見Mattias Frey, *Postwall German Cinema: History, Film History and Cinephilia* (Oxford: Berghahn, 2013), 75, 108.

¹⁰ Jakob Buhre, "Wolfgang Becker," *Planet Interview*, 19 January 2003, <http://www.planet-interview.de/interviews/wolfgang-becker/33649/>,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5; Peter Zelma, "Wider den Ostalgie-Verdacht: Good Bye, Lenin!—Ein Interview mit Wolfgang Becker," *Fluter*, 13 February 2003, <http://film.fluter.de/de/14/kino/1576/>, accessed on April 19, 2015.

¹¹ Nikolaus von Festenberg, "Sandmännchen rettet die DDR: Wolfgang Beckers wunderbare Kinophantasie 'Good Bye, Lenin!' wehrt sich mit viel Ironie gegen den underbittlichen Lauf der Geschichte," *Der Spiegel*, 6 (Feb. 2003), 120,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26271002.html>, accessed on April 16, 2015; Evlyn Finger, "Die unsinkbare Republik: Wolfgang Beckers Tragikomödie Good Bye, Lenin! kennt viele Arten von Gelächter," *Die Zeit*, 6 Feb. 2003; Mattias Frey, *Postwall German Cinema*, 108.

¹² "Interview mit Autor Bernd Lichtenberg," <http://www.good-bye-lenin.de/int-licht.php>,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5.

¹³ Jakob Buhre, "Wolfgang Becker,"; "Interview mit Daniel Brühl," <http://www.good-bye-lenin.de/int-bruehl.php>, accessed on April 19, 2015; "Interview mit Katia Saß," <http://www.79qmdr.de/int-sass.php>, accessed on April 19, 2015; "Ostalgie: Ganz Deutschland lacht und weint über den Film 'Good bye, Lenin!'," *Stern*, 23 November 2003, <http://www.stern.de/panorama/ostalgie-ganz-deutschland-lacht-und-weint-ueber-den-film-good-bye-lenin-516162.html>, accessed on April 19, 2015.

片，訪問過許多德東民眾。¹⁴面對媒體記者對於其西德身份的質疑，編劇表示，為了瞭解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日常生活，他進行了大量閱讀與訪談，並觀賞許多歷史記錄片，而且許多電影情節，便源自於這些研究工作；例如關鍵角色太空人顏(Sigmund Jähn, 1937-)的安排，其靈感便是來自其所觀賞的紀錄片。更要者，利希騰伯格強調，「轉折」之際，也就是創作《再見列寧》劇情大綱之時，他正旅居東柏林，因此對兩德統一對東德人民日常生活的影響，有直接的觀察。¹⁵曾在大學受過歷史訓練的導演也表示，為了拍攝《再見列寧》，他不但與編劇曾和許多年紀較高的東德人進行訪談，蒐集他們的生命故事，並且曾耗時一年在東德「體驗日常生活」，「和劇中男主角年紀差不多的小伙子去酒吧聊天」，以瞭解年輕世代對兩德統一的觀點與記憶。貝克深信，這些準備，讓他得以「聽出30年隔離給他們(東、西德人)帶來的細微差別。」此外，貝克還針對「很多東德時代的電影、書籍、照片、唱片，比如《少先隊之歌》」進行研究，並特意在完成劇本之前，特別「仔細檢查用詞，剔除那些東德人不用的。」¹⁶如此對電影「語言」的謹慎態度，也表現在他為來自西德的男主角布爾所要求的語言訓練之上；應導演之請，布爾也研究了許多關於東德的材料，聆聽許多東德音樂。¹⁷如貝克所言，《再見列寧》編導是用「拍歷史電影的態度」，在從事準備與攝製工作。¹⁸

《再見列寧》呈現東德日常生活之忠實程度，獲得德東觀眾肯定，由破紀錄的亮麗票房，可見一斑。不僅如此，電影確實引起觀眾懷舊東德情緒，即便貝克自己一再聲稱那不是他的興趣所在。¹⁹貝克在訪談中表示，當

¹⁴ Mattias Frey, *Postwall German Cinema*, 109.

¹⁵ "Interview mit Autor Bernd Lichtenberg."

¹⁶ Jakob Buhre, "Wolfgang Becker"; 貝克曾在其他訪談中強調，曾於1974年越過邊界造訪東柏林，對於該城市的氣味與人民的穿著方式記憶猶新，參閱Stephen Applebaum, "Wolfgang Becker: Good Bye, Lenin."

http://www.bbc.co.uk/films/2003/07/16/wolfgang_becker_good_bye_lenin_interview.shtml,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5; Peter Zelma, "Wider den Ostalgie-Verdacht: Good Bye, Lenin!—Ein Interview mit Wolfgang Becker,;" 萬靜波，〈沃爾夫岡·貝克《再見列寧》怎樣拍成〉，《南方人物周刊》，第45期(廣州，2009.11)，頁73-74。

¹⁷ "Interview mit Daniel Brühl."

¹⁸ 萬靜波，〈沃爾夫岡·貝克《再見列寧》怎樣拍成〉，頁74。

¹⁹ "Wolfgang Becker: Nach 'Good bye, Lenin!' auf einmal der Grandmaster der Ostalgie,"

他與觀眾交流座談時，常遇到德東人向他表示，觀賞《再見列寧》讓他們憶起昔日社會主義時光；例如，一位女性曾留著淚眼向他哭訴，電影讓她再度憶起她的童年生活；女主角薩斯也表示，曾遇到許多觀眾感動地向她說，「那就是我以前的生活」。²⁰有趣的是，女主角首次閱讀《再見列寧》劇本之後，根本不敢相信編劇竟是西德人，還驚嘆導演對東德日常生活知識，比她自己還要多，還要正確，著實讓她想起已然遺忘的事情；薩斯也一度懷疑，貝克到底是來自西德，還是東德。²¹相同地，真正的太空人顏在看完電影之後，直覺《再見列寧》中肯呈現了他的祖國，深受感動，因此送貝克一本東德圖冊，以為誌謝。²²凡此種種，足以說明何以許多德東人觀影後，直稱貝克是「榮譽東德人」，²³也足以解釋為何「聯邦公民教育局」(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選擇將《再見列寧》當作德國教授東德歷史的教材，而德東的布蘭登堡州(Brandenburg)教育局長賴賀(Steffen Reiche, 1960)為何倡議在中學播放該影片。²⁴綜上所述，本文將《再見列寧》視為瞭解與研究東德日常生活史的「文化記憶」媒介，也是檢視兩德統一影響東德人民物質消費文化與國族認同取向的歷史性文本。

就劇情的主題設定來看，《再見列寧》旨在描述一個東柏林小家庭故事的主軸上，再現東德日常生活與物質文化，並呈現兩德「轉折」歷程對市井小民的影響。導演表示，該片本身意在講述一個家庭的日常生活史，一個兒子深愛母親的故事，同時檢視「歷史怎麼影響普遍人的生活」，因此劇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April 2004,

<http://www.faz.net/aktuell/feuilleton/wolfgang-becker-nach-good-bye-lenin-auf-einmal-der-grandmaster-der-ostalgie-1143407-p2.html>,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5; Peter Zelma, "Wider den Ostalgie-Verdacht: Good Bye, Lenin!—Ein Interview mit Wolfgang Becker."

²⁰ "Good Bye, Lenin: Hello Humor," *Deutsche Welle*, 23 July 2003,

<http://www.dw.de/goodbye-lenin-hello-humor/a-800319>, accessed on April 19, 2015; "Wolfgang Becker: Nach 'Good bye, Lenin!' auf einmal der Grandmaster der Ostalgie."

²¹ "Interview mit Katia Saß."

²² "Wolfgang Becker: Nach 'Good bye, Lenin!' auf einmal der Grandmaster der Ostalgie."

²³ Daphne Berdahl, "Goodbye Lenin, Aufwiedersehen GDR: On the Social Life of Socialism," 129.

²⁴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From Colonization to Nostalgia*, 131; Mattias Frey, *Postwall German Cinema*, 107.

情聚焦於「描述普遍人民的遭遇」，並不嘗試批判東德政治或觸及其消亡之因。²⁵雖劇情以亞力士及其母親的謊言為環節鋪陳，但編導均表示，不論是亞力士的謊言、他所製作的虛構新聞，抑或者克莉絲汀的謊言，都屬善意的白色謊言，無意藉此批判社會主義制度，而意在呈現部分德東人共享的正面東德記憶。²⁶此一觀點，受到當時若干評論家的肯定，主張《再見列寧》的基調展現出無害的東德意象，且表達對德西與德東社群關係趨向和諧發展之樂觀期待，未見對東德或西德的偏見。²⁷正在此意義上，學者將《再見列寧》解讀為一部攸關新德國國族認同重構的創作，一方面突顯德東社群差異認同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表達德國社會邁向和諧、共同成長的展望。²⁸綜上所述，《再見列寧》之劇情主軸以描述市井生活為基調，未明顯涉及對東德政治之批判，而意在突顯前東德人共享的日常生活記憶，這也部分解釋該片引起德東觀眾共鳴的原因。基於此，本文論證即嘗試指出，《再見列寧》甚至可成為未曾經歷「過去」者，藉以瞭解與認知東德日常生活的「文化記憶」媒介。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就觀者詮釋的角度而言，除了東德日常生活與記憶的觀點之外，《再見列寧》的解讀，仍存在其他觀點的空間。《再見列寧》可以獲致德西與德東觀眾的共鳴，其部分原因，或許就在於其所展現的多元觀點。首先，《再見列寧》透過不同角色演繹，至少表現出三個世代面對東德時期與兩德統一的不同態度：老年人、中年人與年輕人。導演曾具體指出，除了描繪中、老年世代的態度與反應之外，他特別注意二十歲

²⁵ 萬靜波，〈沃爾夫岡·貝克《再見列寧》怎樣拍成〉，頁73；“Wolfgang Becker: Nach 'Good bye, Lenin!' auf einmal der Grandmaster der Ostalgie.”

²⁶ “Interview: Good Bye, Lenin,” AlloCiné, 9 September 2003, http://www.allocine.fr/article/fichearticle_gen_article=18357517.html, accessed on April 17, 2009; “Wolfgang Becker: Nach 'Good bye, Lenin!' auf einmal der Grandmaster der Ostalgie”; Patricia Thomson, “Good Bye, Lenin: Hello, Wolfgang Becker,” Indiewire, 9 August 2004, http://www.indiewire.com/article/goodbye_lenin_hello_wolfgang_becker, accessed on April 19, 2015; “Interview mit Autor Bernd Lichtenberg.”

²⁷ Mattias Frey, *Postwall German Cinema*, 109-110; Mary-Elizabeth O'Brien, *Post-Wall German Cinema and National History*, 76.

²⁸ Mary-Elizabeth O'Brien, *Post-Wall German Cinema and National History*, 65; Mattias Frey, *Postwall German Cinema*, 108.

年輕世代的觀點，尤其是年輕人所表現出來的選擇性、正面的東德記憶，而這也成為影片中男主角亞力士的觀點。貝克提醒觀眾，根據他與編劇在東柏林與年輕德東人的訪談經驗，其實並不存在一個典型、唯一的東德日常生活記憶版本，《再見列寧》無法呈現全部的觀點，尚存在許多其他觀點的空間。²⁹在本文論證過程中，將兼及三個世代面對兩德統一之不同觀點的分析。

其次，《再見列寧》一方面鋪陳東德日常生活景象，另一方面確也反映出對兩德統一後續發展的樂觀展望。³⁰誠如男主角布爾接受訪談時表示，兩德統一之後，德東與德西社群確實正走向和諧、一同成長的方向。³¹針對《再見列寧》所呈現之對於兩德統一的樂觀展望，及其意義，下文也將有所探討。

然而，在兩德統一的樂觀展望背後，是否可能隱藏無可避免的西德觀點？如前所述，面對輿論，貝克經常強調《再見列寧》主要在描述一個以兩德統一為背景的母子相愛故事，意在從中刻畫東德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以及部分德東人共享的東德記憶，無關政治，無涉社會主義制度的批判。但是，若從觀者觀感與詮釋的角度思考，若干評論家認為《再見列寧》所呈現的東德，確實可能是以西德觀點折射出來的結果。例如，埃格爾(Christian Eger)在《我短暫的夏日東德懷舊》(*Mein kurzer Sommer der Ostalgie: Ein Abspann*)中即指出，《再見列寧》創造了一個西德視角下的東德意象，而影片幽默手法背後，其實隱藏著對德東人的疏離與距離感。³²但也有評論家認為，《再見列寧》其實很公平，同時表達了對於東德共產體制與西德資本主義過渡消費的批判。³³更甚者，若干學者主張，《再見列寧》不僅表現了「懷舊東德」，其實也表現了「懷舊西德」(Westalgie)現象。³⁴凡此種種，讓《再見列

²⁹ “Good Bye, Lenin: Hello Humor.”; Stephen Applebaum, “Wolfgang Becker: Good Bye, Lenin.”

³⁰ Mattias Frey, *Postwall German Cinema*, 66.

³¹ “Interview mit Daniel Brühl.”

³² Christian Eger, *Mein kurzer Sommer der Ostalgie: Ein Abspann* (Dössel: Janos Stekovics, 2004).

³³ Mattias Frey, *Postwall German Cinema*, 75.

³⁴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105, 160; Andrew Ploman,

寧》的解讀更為多元，層次更為豐富，但限於篇幅，需另文處理。為了讓論證更為集中，本文即以「文化記憶」的分析取徑出發，聚焦探討《再見列寧》所再現的德東人統一與東德記憶、「懷舊東德」及其歷史脈絡，以及影片與「懷舊東德」在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上的意義。

基於上述，本文將《再見列寧》視為再現東德日常生活與「懷舊東德」(Ostalgie)現象的歷史文本。“Ostalgie”由“Ost”(東)與“Nostalgie”(懷舊)兩個字組成，意指對東德的懷舊，本文以「懷舊東德」名之。「懷舊東德」具體指涉兩德統一後德東人將其對東德日常生活的憧憬，投射於社會主義時期物質文化與商品的消費之上，並於1990年代中期蔚為風潮。若干文化批評家認為，此一現象是德東人「想要回歸極權體制」的一種「無用的情緒」。³⁵但如此指涉，實有簡化、貶抑「懷舊東德」之嫌。本文嘗試論證，「懷舊東德」的意涵十分複雜，並非只是回到「極權體制」的憧憬之情，而是對該時期意義的選擇性重新認知。亦即，緣於統一歷程中各方面的挫折與失落感，以及官方國史論述對於東德史的「去合法化」(delegitimatization)傾向的雙重否定，使德東人形成「二等公民」的自我認同，而企圖經由東德物質文化與商品消費的想像性空間，形塑其身份認同的「反抗記憶(oppositional memory)」，整體反映「後轉折」(post-Wende)時期德國國族認同論述衝突的結果。³⁶然而，為何來自極權時期的商品，得以轉義為德東人書寫其另類東

“Westalgie? Nostalgia for the ‘Old’ Federal Republic in Recent German Prose,” *Seminar: A Journal of Germanic Studies*, 40:3 (2004), 249-261; Julia Hell and Johannes von Moltke, “Unification Effects: Imaginary Landscapes of the Berlin Republic,” *Germanic Review*, 80:1 (Winter 2005), 74-95.

³⁵ Jennifer M. Kapczynski, “Negotiating Nostalgia The GDR Past in *Berlin Is in Germany and Good Bye, Lenin!*,” *The Germanic Review: Literature, Culture, Theory*, 82:1 (2007), 84.

³⁶ Patricia Hogwood, “Identity in the Former GDR: Expression of ‘Ostalgie’ and ‘Ossi’ Pride in United Germany,” in Paul Kennedy, ed.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Crisis or Opportunity* (New York: Palgrave, 2001), 64-79;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East German Mem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2:3 (Sept. 2000), 731-765; Martin Blum, “Remaking the East German Past: Ostalgie, Identity, and Material Cultur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34:3 (Winter 2000), 229-253;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Ethnos*, 64:2 (1999), 192-211.

德史或「反抗記憶」的寄託呢？本文將《再見列寧》定義為「懷舊東德」現象「文化記憶」媒介的探討，希冀提供一個新的檢視角度與觀點。

電影與文化研究學者將《再見列寧》視為德國「懷舊東德」風潮最具代表性的文藝創作，認為它再現統一後無法定義其國族認同身份的德東人，企圖藉東德商品的消費，再建構一個「博物館化」(museumification)的想像性空間，以抵制新德國統一政策與官方東德史書寫，及其背後的西德政治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為自己發聲，最後從中找到他們在「後轉折」時代的身份認同。³⁷此一理解，在以「懷舊東德」角度詮釋《再見列寧》的論證邏輯下，具有重要意義，但缺乏歷史發展脈絡的具體探討，無法呈顯時代變遷風貌，許多問題仍待進一步釐清與解答。

首先，為何《再見列寧》可構成一個想像性空間，讓德東人反抗新德國官方國史論述下的東德歷史書寫，進而建構他們的身份認同？換言之，

³⁷ Crystal Downing, "Staging Ideology and Love in Good Bye, Lenin!," *Film and History*, 43:2 (Fall 2013), 5-16; Oana Godeanu-Kenworthy, "Deconstructing Ostalgia: The National Past between Commodity and Simulacrum in Wolfgang Becker's Good Bye Lenin! (2003),"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41 (May 2011), 161-177; Timothy Barne, "When We Was Red: Good Bye Lenin! And Nostalgia for the 'Everyday GDR',"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6:2 (June 2009), 132-151; Jennifer Creech, "A Few Good Men: Gender, Ideology,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The Lives of Others and Good Bye, Lenin!," *Women in German Yearbook*, 25 (2009), 100-126; Jennifer M. Kapczynski, "Negotiating Nostalgia: The GDR Past in Berlin Is in Germany and Good Bye, Lenin!," *The Germanic Review: Literature, Culture, Theory*, 82:1 (2007), 78-100; Roger F. Cook, "Good Bye, Lenin!: Free-Market Nostalgia for Socialist Consumerism," *A Journal of Germanic Studies*, 43:2 (2007), 206-219; Roger F. Cook, "Nostalgic Travels through Space and Time: Good Bye, Lenin," in Christina Lee, *Violating Time: History, Memory, and Nostalgia in Cinema*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70-87; Matthias Uecker, "Fractured Families-United Countries? Family, Nostalgia and Nation-Building in Das Wunder von Bern and Goodbye Lenin!," *New Cinema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Film*, 5: 3 (2007), 189-200; Joseph F. Jozwiak and Elisabeth Mermann, "'The Wall in Our Minds?' Colonization, Integration, and Nostalgia,"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39:5 (2006), 780-795;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128-136; Berdahl, "Goodbye Lenin, Aufwiedersehen GDR: On the Social Life of Socialism," 121-133; Andreas Böhn, "Memory, Musealization and Alternative History in Michael Kleeberg's Novel Ein Garten in Norden and Wolfgang Becker's Film Good Bye, Lenin!," in Silke Arnold-de Simine, ed. *Memory Trac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5), 245-260.

空間與認同之間的關係為何？一個想像性空間如何構成形塑認同的基礎？基於第一部分解構《再見列寧》的基礎上，本文第二部分將以歷史記憶為研究取徑，探討《再見列寧》中所涉及之群體記憶與認同的建構性、物質性、儀式性與空間性因素，再以「空間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³⁸的學理概念，進一步探析記憶、認同與空間之間的關係。如此分析取徑，有助於具體展示《再見列寧》實為探究記憶與認同建構的極佳案例，在歷史記憶研究的學理探討與應用歷史教學上，均有其重要意義。

其次，在以《再見列寧》為主要研究素材探討的侷限性下，所謂「懷舊東德」圖像的描繪，稍嫌簡化或標籤化，無法具體說明「懷舊東德」指涉的是「哪一個時期」？被重構與消費的東德物質文化與商品源自「那一個時期」？最根本的問題或在於，東德日常生活與物質文化之消費，何以成為「懷舊東德」的主要表現形式？本文在定義《再見列寧》為「懷舊東德」之「文化記憶」媒介的基礎上，在第三至第五部分，將進一步擴大檢視角度，運用報刊與重要研究論著等相關材料，剖析「懷舊東德」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脈絡，釐清德國統一前、後消費文化的特徵及其變遷，以解答「懷舊東德」的時代性與物質性問題。再者，聚焦於《再見列寧》是為德東人另類東德史書寫媒介，論者對新德國官方國史論述下的東德史書寫著墨明顯較少，到底其具體內涵為何？何以「轉折」後的官方東德史書寫，讓德東人覺得有必要建構一個另類歷史書寫，以對抗官方的主宰性論述呢？本文利用重要官方文獻與相關論著之詮釋，歸納德國統一後官方東德史書寫主要特徵，指出其與「懷舊東德」所再現之另類東德史書寫之間的差異，解釋何以無法在統一的新德國社會當中找到身份認同的德東人，必須透過消費東德商品的方式，形塑其另類身份認同？

以上由「文化記憶」視角檢視「懷舊東德」歷史脈絡的論證，有助本文以歷史記憶研究取徑，建立對《再見列寧》的新詮釋與新觀點，期建立

³⁸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在本文的詞彙使用上，將以「空間」為主，但在某些論證中，「空間」和「地方」兩者可互通，其學理基礎在於，文化地理學家克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即將「地方」定義為：在人類個體或群體權力脈絡當中，被賦予意義的空間，參閱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Socio Publishing Co., 2006), 7-12.

臺灣學界對「懷舊東德」的理解與研究。³⁹再者，從「文化記憶」角度檢視《再見列寧》與「懷舊東德」現象，也提供一個探析懷舊商品化，並凸顯人類社會使用「過去」之商業因素的重要個案，期對臺灣歷史記憶研究從事經濟面向的探討，能有所貢獻。

二、大時代與小人物歷史鑲嵌畫

在東德日常生活的懷舊氛圍中，《再見列寧》訴說一個由兩德分治過渡到統一「轉折」中的東柏林單親家庭故事。藉諷諧劇情之鋪陳，《再見列寧》展示大時代對小人物的影響，呈現市井生活的個人記憶與國族關鍵時刻的集體記憶，如何鑲嵌在一起。如此透過「現實」大時代與「虛構」小人物生活的對話，所交織在一起的鑲嵌畫，使《再見列寧》更具歷史感。在重演東德的主軸下，《再見列寧》具體呈現小家庭各成員——社會主義者母親克莉絲汀(Christiane Kerner)、順應時代潮流的姐姐亞麗雅娜(Ariane Kerner)，以及忙著在「七十九平方公尺」房間中「延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⁴⁰的弟弟亞力士(Alex Kerner)——面對時代變局的多元態度與觀點。為了本文第二部分以後的論證，有必要在第一部分說明《再見列寧》的結構及其重要情節。

隨著兩德統一的發展歷程，《再見列寧》劇情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第一個部分，旨在描述亞力士一家在東德的日常生活史。影片伊始，導演利用東德時期的地、物與人，帶領觀眾進入現實中已消逝的東德：柏林圍牆、⁴¹柏林電視塔(Fernsehturm Berlin)、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世界鐘(Weltzeituhr)⁴²、列寧雕像、⁴³新崗哨(Neue Wache)⁴⁴等象徵性地標；P2國宅公

³⁹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East German Mem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733-734.

⁴⁰ Roger F. Cook, "Nostalgic Travels through Space and Time," 72.

⁴¹ 柏林圍牆興建始於1961年8月13日，是兩德分治與冷戰時期民主與共產陣營對抗的有形象徵。1980年代末，兩德遂邁向交流與統一，柏林圍牆形同虛設，最終於1990年6月起正式拆除。參閱Brian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Confronting German History in the Urban Landsca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7-39.

⁴² 1950年代末，東德當局為再造首都東柏林，藉以展現社會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與高度發展，在亞歷山大廣場鄰近區域興建大型公共建築，陸續於1969年東德建國二十週年紀念前後完成，其中即包括柏林電視塔與亞歷山大廣場的世界鐘。其中，高度

寓(P2 Plattenbau)與601托笨車(Trabant 601)⁴⁵等1960年代以來的東德工業品；東德第一位太空人顏的新聞；克莉絲汀指揮「少年先鋒隊」(Jungpioniere)合唱「我們的祖國」(Unsere Heimat)的影片。亦即，《再見列寧》呈現許多象徵東德的「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émoire; realm of memory)。⁴⁶

其次，《再見列寧》第一部分，也呈現兩德分治變局如何與亞力士一家生活交織在一起。正當太空人顏成功登上太空之際，不具德意志統一社會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以下簡稱統一社會黨)黨員身份的亞力士之父，因不堪壓迫逃亡西德，家庭因此分裂，如亞力士回憶：「當席格蒙代表我國登上太空時，我父親正身處資本主義的異鄉，被階級敵人女友迷得團團轉。」(GBL, 03:44)亞力士之母克莉絲汀，在丈夫逃亡西德，以及東德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的壓力下，陷入失語狀態，進

達368公尺的柏林電視塔，是當時柏林最高建築，寓意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也正由於其社會主義色彩，統一後德國輿論甚至出現拆除該建築的主張。參閱Peter Müller, *Symbol mit Aussicht, Der Berliner Fernsehturm* (Berlin: Verlag Bauwesen, 2000), 125; Brian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189-190.

⁴³ 東柏林列寧紀念雕像落成於1970年，是列寧百年誕辰紀念建築，於兩德統一後因其社會主義色彩而於1992年遭到拆除。參閱Brian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196-199; Dirk Verheyen, *United City, Divided Memories?: Cold War Legacies in Contemporary Berlin*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8), 216-217.

⁴⁴ 新崗哨完工於1818年，直到二十世紀初，都是保護德意志帝國皇帝衛兵軍營的駐紮處。威瑪共和時期(Weimarer Republik)以來至二戰前，新崗哨轉化成一戰陣亡將士紀念性空間，並於1960年改建為「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受難者紀念館」(Mahnmal für die Opfer des Faschismus und Militarismus)。兩德統一後，在總理柯爾的堅持下，於1993年改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戰爭與獨裁受難者紀念館」(Zentrale Gedenkstät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ür die Opfer von Krieg und Gewaltherrschaft)，於內部展示科勒惠芝(Käthe Kollwitz, 1867-1945)創作的著名雕像「母親與亡子」(Mutter mit totem Sohn)，並引起爭議。參閱Brian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217-224; Dirk Verheyen, *United City, Divided Memories?*, 39-48.

⁴⁵ P2公寓與601托笨車都是1960年代東德經濟現代化改革下的產物，也成為象徵東德的物質文化。參閱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51; Daphne Berdahl, "Go, Trabi Go! Reflections on a Car and its Symbolization over Time," 60-68.

⁴⁶ Pierre Nora,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esp. 18-24。「記憶所繫之處」即歷史記憶研究史家諾哈(Pierre Nora)所指"lieux de mémoire (realm of memory),"本人在此使用戴麗娟譯法，稱其為「記憶所繫之處」，見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2012)。關於「記憶所繫之處」的具體意涵，本文第二部分有所討論。

入療養院八週，痊愈後全心投入社會主義事業，形同「嫁」給東德，成為懷抱改革熱誠的社會主義者，甚至獲頒國家勳章。克莉絲汀經常草擬商品申訴書，抱怨商品瑕疵與選擇性少等問題。如此，克莉絲汀表現出社會主義體制雖不理想，但可進行體制內改革的態度。

《再見列寧》的第二部分，意在勾勒兩德統一變局及其對亞力士一家的影響。一開始以東德第四十個、也是最後一個國慶的場景，帶入1989至1990年的「轉折」。國慶閱兵大典進行時，克莉絲汀正在考慮是否參加當晚的慶祝大會，而對國慶略顯冷漠的亞力士，則準備參加當晚的示威遊行。《再見列寧》再現1989年10月7日東德人示威遊行遭國家鎮壓的情況，而當時正前往慶祝大會的克莉絲汀，目擊鎮壓過程，甚至發現亞力士也出現在示威群眾之中。大時代變局對小人物的牽扯力量或許過大，克莉絲汀心臟病發，陷入昏迷達八個月，期間兩德經歷「轉折」變局。從1989年10月至1990年6月，克莉絲汀無緣目睹高喊「我們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的群眾示威、統一社會黨總書記與東德國務委員會主席何內克(Erich Honecker, 1912-1994)辭職下台、兩德邊界開放、柏林圍牆倒塌、⁴⁷首次民選政府等關鍵時刻。期間，亞力士工作的國營電視維修站歇業，之後任職於衛星天線公司，與來自西德的丹尼斯(Denis Domaschke)組成工作小組，象徵兩德統一，並在醫院與在街頭示威邂逅的拉荷(Lara)重逢成為情侶。亞力士的姐姐放棄學業，在象徵資本主義的漢堡王(Burger King)工作，並結識西德「階級敵人」韓納(Rainer)。克莉絲汀的同事與鄰居們，則被迫退休或失業。

此外，「轉折」變局，也具體反映在市井小民住家內部陳設，以及東柏林城市景觀的改變上。如亞力士所言，他們的公寓，正經歷「平穩而緩慢的西化過程」(GBL, 19:07)；西方商品如賓士(Mercedes-Benz)、寶馬(BMW)、宜家(IKEA)等西方商品，也入侵東柏林街頭；可口可樂(Coca Cola)卡車，從

⁴⁷ 在1989年東德所掀起的改革熱潮之中，東德政府被迫不斷開放跨越國界旅行與簽證限制，在11月9日的相關新聞記者會上，政府發言人甚至指稱永久開放對西德與西柏林邊界的政策，使柏林圍牆形同虛設，柏林圍牆的拆除則要到1990年6月才正式開始。參閱“Resolution of the Ministerrat of the GDR regarding the Opening of the Border to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West Berlin,” 59-60;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45-246.

新崗哨前呼嘯而過；P2公寓陽台上，出現衛星天線。凡此種種，具現政治與城市景觀變遷的辯證關係。克莉絲汀因沈睡，無緣見證劇變，但或許如亞力士所說：「這樣最好，她的終生信仰瞬間消失殆盡，不費吹灰之力……。」(GBL, 24:23)

克莉絲汀在兩德統一前甦醒，亞力士為母親生命存續，建構一個現實中已不存在的「東德」，⁴⁸這是《再見列寧》第三部分，也是最有趣的部分。甦醒後的克莉絲汀仍顯虛弱，且有失憶症狀，醫生叮囑必須避免致命的刺激。亞力士深信，「轉折」變局對克莉絲汀勢必造成致命影響，因而籌劃「用盡全力讓東德起死回生」(GBL, 50:51)的計畫；如《再見列寧》廣告標語所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七十九平方公尺小房間的延續」。⁴⁹這項重構「東德」的計畫，從再改造已經「西化」的房間開始。為恢復母親房間的原本模樣，亞力士搬來東德時期的床鋪、書桌、書架、書籍與社會主義偶像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照片，搭建了一個「東德」的建構性空間。為了讓此一「東德」中的演員看起來更逼真，亞力士設法找來昔日服飾，讓姐姐不由得感嘆：「看我們以前穿的爛貨。」(GBL, 34:49)

然而，由於持續變化的現實與亞力士建構的「東德」之間，時常出現明顯落差，亞力士被迫不斷重構東德物質文化。例如，克莉絲汀甦醒後表示想吃「斯博特醃瓜」(Spreewälder Gurken)⁵⁰時，因當時東德超市已搖身一變為西方商品的消費天堂，亞力士只好設法找到斯博特醃瓜空瓶置入西方商品，以滿足母親需求。其他諸如「金摩卡咖啡粉」(Mocca Fix Gold)、「福林硬麵包」(Fillinchen Crisp Bread)等東德商品，亞力士也以同樣方式「製作」。如後文將嘗試論證，兩德統一初期被市場淘汰的東德商品，再度出現在亞力士的「東德」世界中，具體再現了「懷舊東德」風潮，且具有深意。

從現實世界闖入的不尋常現象，經常構成「東德」世界的危機，亞力士因而必須虛構故事，以合理解釋這些危機。例如，在亞力士精心「導演」

⁴⁸ 本文以加上引號的「東德」指涉亞力士所建構的虛構「東德」，另未加引號的東德則指涉歷史現實中的東德。

⁴⁹ Roger. F. Cook, "Nostalgic Travels through Space and Time," 72.

⁵⁰ Ursula Henizelmann, "Spreewälder Gurken: Pickled Cucumbers from the Spreewald," *Gastronomica: The Journal of Food and Culture*, 4:3 (2004), 13-17.

的生日會上，東德演員、道具與「少年先鋒隊」歌唱「我們的祖國」等儀式活動齊備，眼見亞力士「用盡全力讓東德起死回生」的生日會將完美落幕之際，克莉絲汀卻從窗口看到可口可樂大型廣告。亞力士當下沒作解釋，只以「我想事出必有因，凡事都有答案」(GBL, 1:00:57)一語帶過。之後，亞力士在西德同事協助下，模擬東德政府政治宣傳工具的「當代新聞焦點」(Aktuelle Kamera)⁵¹，虛構可口可樂原始配方實來自東德實驗室的新聞，企圖以「可口可樂是社會主義的發明」(GBL, 1:04:11)說辭，合理化可口可樂廣告出現在東柏林景觀的不尋常現象。另一次，克莉絲汀在離開公寓後看到西德人和西德品牌汽車。為解釋這些不尋常現象，亞力士再度虛構新聞，指稱何內克宣佈政治庇護西德人的「兩德團結」政策，透過原本記錄東德人衝向西德的畫面，解釋由於西德經濟狀況衰退與新納粹興起，導致大量西德人逃往東德。克莉絲汀貌似深信不疑，亞力士再度解決了一次危機，誠如亞力士所言：「那天當我凝視雲彩，我領悟到事實是一種曖昧的概念，要改成媽看世界的角度很容易」(GBL, 1:03:05)。針對此，本文第二部分將藉此討論個人與群體記憶的建構性。

《再見列寧》第三部分也再現了兩德正式統一的跡象，其中最具象徵意義者莫過於世足賽、貨幣聯盟與亞力士姐姐懷了「東西德結晶的寶寶」等情節。《再見列寧》描述「讓東德起死回生的」的過程中，不斷穿插西德國家隊世足比賽畫面，顯示東、西德人一起加油的歡樂情緒，貌似德國已然統一。當西德以5:4力克英格蘭進入決賽時，亞力士東、西德同事一起同聲喝彩，誠如亞力士所言：「一個小球(足球)使這個分裂國家的社會發展合而為一，也讓『本是同根生』的東西(兩德)再一起成長。」(GBL, 50:42)兩德共同「歡慶即將來臨的足球勝利」的情緒，也表現在一起出現在東柏林街頭的兩德國旗。當「德國足球隊超越原訂目標贏得世界冠軍」(GBL, 50:42)時，亞力士與拉荷目睹了兩德群眾一起施放煙火慶祝的畫面。若說世足冠軍呈現的是兩德邁向統一的榮景，則兌換西德馬克則為亞力士一家帶來暫

⁵¹ 「當代新聞焦點」是東德國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電視台(Fernsehen der DDR)新聞節目，是東德時期統一社會黨政治宣傳工具，1952年12月21日首播，自1957年10月11日起每日於晚間七時半播出至1990年12月14日。

時的狂喜與空虛。1990年7月起，在貨幣聯盟政策下，德國馬克取代東德馬克成為官方貨幣，預告兩德統一。為了將母親存款兌換成德國馬克，亞力士和姐姐藉口預訂三年的拖笨車已可交貨，以便取得母親銀行存摺及其授權。然而，母親其實把錢藏在櫥櫃抽屜夾層，姐弟想盡辦法後，終在堆置街頭的櫥櫃中找到它們。但因已過兌換期限，亞力士只能將紙鈔撕碎，撒向東柏林夜空。在電影第三部分結束之際，亞力士姐姐懷了「東西德結晶的寶寶」(GBL, 1:25:08)，緊接著出現兩德於1990年9月12日簽署「最後解決德國問題條約」(Vertrag über die abschließende Regelung in bezug auf Deutschland)的畫面。

正當德國統一之際，亞力士一家遭遇一連串關鍵性轉折，父親再度出現與克莉絲汀的離世，成為《再見列寧》第四部分的主題。在兩德邊界開放後，為響應政府收容難民的政策，一家人共乘韓納買的拖笨車，伴著東德歌曲的吟唱，前往渡假小屋。回憶昔日家庭時光後，克莉絲汀突然坦承，亞力士的父親並非為了「階級敵人」女友而逃亡西德，而是因遭受統一社會黨壓迫而選擇前往西德，期間也寫了很多信件，並非毫無音訊。當時的克莉絲汀，因獨自帶著小孩，面臨申請出境簽證的困難，以及失去兩姐弟的壓力，最後選擇留在東德，並為合理化其「今生最大錯誤」而撒謊。或許預料自己已到生命末端，克莉絲汀希望能夠再見亞力士父親一面。當晚，克莉絲汀再度送醫。亞力士姐姐則急忙尋找信件，證明父親的存在。亞力士一開始無法接受真相，但眼見母親垂危，便設法尋找父親。最後，坐著「像來自過去記憶的鬼魂」(GBL, 1:35:17)的太空人顏所駕駛的計程車，亞力士來到父親住處，請求他見母親一面，如此分散兩德的一家人終於團聚。但此時，拉荷貌似已向克莉絲汀透露亞力士建構「東德」的善意謊言。

在順利將父親帶到母親病榻旁之後，亞力士決定提出其對兩德統一的個人詮釋。在亞力士的另類兩德統一想像中，找來昔日國家英雄太空人顏飾演國家主席，並藉由他口重新定義兩德統一：

……過去的仇敵如今卻想與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堅信的理想將激發全世界，或許我們一時看不清目標，但我們會設法重新對焦。社會主義並非自築高牆，它必須向外推展與人民共存，不只夢想一

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是讓它付諸實行。因此，我決定開放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邊界。(GBL, 1:48:28)

顯然已知道真相的克莉絲汀，仍帶著微笑回應亞力士的白色謊言。

《再見列寧》最後以克莉絲汀逝世紀念儀式作結，象徵舊東德的消逝，寓言德國歷史新頁的到來。遵行母親遺願，亞力士舉辦了一個紀念儀式，在親友見證下，克莉絲汀骨灰隨火箭升上柏林天空，在燦爛煙花中隨風而逝。這場屬於市井小民的煙火，寓意隨著一位理想社會主義者的離世，真實的東德走入歷史，正式揮別列寧象徵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而亞力士建構的「東德」則將永存在他的記憶之中，正如《再見列寧》的結論：「媽腦海中的祖國是她堅信的，這烏托邦守護母親直到最後。一個壓根不存在的國家，一個在我的回憶中永遠與我母親身影相繫的國家。」(GBL, 1:52:10) 如此，小人物與大時代的歷史與記憶鑲嵌在一起。

整體而言，《再見列寧》以兩德統一作為敘事背景，呈現時代變局如何牽動小人物命運，以及小人物如何賦予時代變局另類意義的過程。如此交織而成的歷史鑲嵌畫，顯示《再見列寧》是一部以東德視角再現兩德統一背景下市井小民日常生活變遷的歷史電影創作，但有兩層意義可茲進一步探究。首先，如本文第二部分將進一步嘗試延伸論證，《再見列寧》是一個可藉以具體探析個人和群體記憶建構之物質性、儀式性與空間性因素的絕佳個案。其次，跳脫《再見列寧》於歷史記憶研究學理性意義的討論，本文再進一步將之定義為同時承載東德日常生活經驗與「懷舊東德」的「文化記憶」媒介。依此，本文第三至第五部分以「文化記憶」為分析視角檢視「懷舊東德」的歷史脈絡，追溯東德消費文化的發展與變遷，從中論證《再見列寧》作為「懷舊東德」之「文化記憶」媒介的歷史性與物質性基礎。

三、記憶、認同與空間之建構

謊言、新聞與儀式三個關鍵詞構成《再見列寧》劇情主要環節，不但訴說兩德統一變局中的小人物故事，也具體呈現個人與群體記憶和認同的建構性、物質性、儀式性與空間性。謊言指的是亞力士千辛萬苦「讓東德

起死回生」的善意謊言，其意在恢復、凝聚或創造母親克莉絲汀「穩定的身份認同」(stable identity)⁵²而重新建構「東德」。其中，亞力士利用昔日東德傢俱、照片、書籍、服飾、新聞等物質媒介，使該「東德」空間更具真實感。其次，為合理解釋出現在「東德」空間中的不尋常現象，亞力士以虛構新聞的方式，讓未曾經歷「轉折」變局的克莉絲汀，接受他所建構的有關於「過去」的知識與詮釋，進而產生對「現在」意義的認知與理解。再者，在其營造的「東德」，亞力士一方面以生日儀式喚回克莉絲汀的社會關係、社群記憶與身份認同，另一方面以死亡紀念儀式標示「東德」空間隨克莉絲汀離世的消亡，並寓意德國歷史新頁的展開。以下本文運用阿博瓦胥(Maurice Halbwachs)、諾哈(Pierre Nora)、康諾頓(Paul Connerton)、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與艾斯曼(Jan Assmann)等學者之學理概念，分析亞力士「讓東德起死回生」計畫所涉之「過去」意義的認知過程，以及群體記憶與身份認同的建構性、物質性、儀式性與空間性，如此突出《再見列寧》在歷史記憶研究上的學理意義。

首先，從個人與群體記憶之社會性建構的角度，來分析亞力士所創造的「東德」。⁵³根據阿博瓦胥的《記憶的社會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社會記憶即個人與社群對特定「過去」的知識與意義認知，本質上乃在社群之中形塑的結果。⁵⁴由於個人無法經歷所有發生的「過去」，勢必得由其所屬社群獲得相關「過去」的知識，因此形同「借來的記憶」。⁵⁵其次，社群記憶必隨政經變局不斷重構，如阿博瓦胥指出：「實際上，過去並非如實重現...而是基於『現在』的重新建構。」⁵⁶換言之，個人或社群對「過

⁵² Timothy Barney, "When We Was Red: Good Bye Lenin! And Nostalgia for the 'Everyday GDR'," 145.

⁵³ 關於歐美與臺灣歷史記憶研究的學術史討論，可詳見潘宗億，〈浮現北京城的時間中軸線：中國首都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及其意義變遷〉，《近代物質文化研究：第一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4)，頁351-356。

⁵⁴ Maurice Halbwachs, "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 1992), 35-189.

⁵⁵ Maurice Halbwachs, "Historic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Francis J. Ditter, Jr. and Uida Yazdi Dit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0] 1980), 51.

⁵⁶ Maurice Halbwachs, "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39-40.

去」知識的習得與意義的認知，乃隨「現在」需求進行再建構。並且，此一重構「過去」之認知，傾向與官方歷史書寫與主宰性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等論述一致。亦即，「過去」意義認知之重構，實涉及權力關係及其結構翻轉的歷程，臺灣戰後政權變易與歷史教科書編寫在「中國化」與「臺灣化」的拉鋸就是一例。⁵⁷

同樣地，《再見列寧》的「東德」中，亞力士對兩德統一歷程以及不尋常現象的合理化詮釋，構成了克莉絲汀認知過去及其現在意義的主宰性論述「來源」。由於昏迷無法親歷「轉折」，身處建構的「東德」，克莉絲汀對「轉折」的相關知識與意義認知，都是從亞力士「借來」的，兩者的關係，體現了未能經歷過去的個人，接受社群權威建構之「過去」知識與意義認知的關係。其中，亞力士對「過去」知識與「現在」意義的重構，若要對克莉絲汀產生意義，則必須以舊東德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與語言呈現，並在此論述框架下虛構新聞，以賦予不尋常現象「合理」的「現在」意義與認知。例如，亞力士以「當代新聞焦點」為語言表達形式，用「可口可樂是『社會主義』的發明」的意識形態說辭，來合理化母親看見的可口可樂巨幅廣告。又如，亞力士以虛構的「兩德團結」政策，來解釋母親在街頭看到的西德年輕人、汽車與商品等不尋常現象。如此具東德政治意識形態的說辭，自然容易被克莉絲汀接受，並產生意義，因此亞力士會說：「那天當我凝視雲彩，我領悟到事實是一種曖昧的概念，要改成媽看(認知)世界的角度很容易」。這裡，「媽看(認知)世界的角度」指的便是東德社會主義論述，亦即亞力士建構其「東德」論述的社會性框架。甚者，亞力士以此框架為基礎，利用虛構新聞，書寫兩德統一的另類論述，如亞力士所言：「不知怎麼了，我的計劃也自行找到出路，我為母親一手打造的東德，逐漸變成我所期望的。」(GBL, 1:22:56)這個「期望」的出路，表現在開放兩德邊界的虛構新聞當中，「像來自過去記憶的鬼魂」的太空人顏，以國家領導人名義宣示：「社會主義並非自築高牆，它必須向外推展與人民共存，不只夢想一個

⁵⁷ 蕭阿勤，〈書寫民族歷史〉，《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2012)，頁273-322；王甫昌，〈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的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第8卷第2期(臺北，2001.12)，頁145-208。

更美好的世界，而是讓它付諸實行。因此，我決定開放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邊界。」在亞力士的另類詮釋中，與歷史現實正好相反，是由東德主動開放邊界；由西德越過邊界到東德的人潮，則象徵社會主義的勝利，以及一個更好的東德的出現。如此，亞力士不但重新詮釋兩德統一，也重新定義社會主義。⁵⁸《再見列寧》中曾經歷「轉折」的其他角色，可輕易辨別亞力士謊言之虛實，但亞力士的另類歷史書寫，卻讓克莉絲汀信以為真。《再見列寧》中亞力士虛構新聞的作法，具體呈現社群記憶形塑的社會性與建構性，同時也突顯大眾傳播媒介在現代社會建構與傳遞事物意義認知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⁵⁹

然而，要重構不復存在的「東德」，物質性與儀式性記憶媒介之運用也具重要意義。根據諾哈，「記憶所繫之處」意指具物質性、功能性與象徵性之文本論述、儀式性身體實踐、紀念節日、物質與空間等承載群體記的媒介，而這些象徵並形塑群體認同的媒介，則是群體記憶具體化或物質化的結果。⁶⁰1984至1992年間，諾哈以「記憶所繫之處」之研究取向為基礎主編

⁵⁸ 在一媒體訪談中，導演貝克也具體表示，《再見列寧》中的亞力士，不僅為了母親，也是為了自己而重建一個東德，而且是一個理想中更好的東德。參閱“Wolfgang Becker,” Planet Interview, (January 19, 2003), <http://www.planet-interview.de/interviews/wolfgang-becker/33649/>, accessed on April 19, 2005.

⁵⁹ 值得注意，就個人與群體記憶的建構性而言，《再見列寧》中亞力士的謊言和義大利影片《美麗人生》(Life is Beautiful, 1997)中父親所編造的謊言有異曲同工之妙。《美麗人生》以諷諧手法描寫二戰期間一對猶太人父子在集中營的故事，異於多數猶太人大屠殺劇情片。在影片中，為了不讓兒子約書亞(Joshua)產生對集中營的恐懼，在前往集中營途中，父親基多(Guido)告訴年幼兒子他們即將去集中營參加一場「遊戲」，最後贏家將獲得一臺坦克車作為獎品。進入集中營後，父親便時常以「遊戲」論述來解釋他們在集中營的各種情況與危險。在「遊戲」過程中，父親最後雖為解救兒子犧牲了生命，但結局卻是喜悅的。最終，美國大兵解放了集中營，原本躲藏起來的兒子獲救，並搭上美國坦克車與她的母親團圓。對年幼的約書亞而言，他對於集中營的認知，深深受到父親「遊戲」論述所影響，真的認為他贏得遊戲並贏得一臺坦克車。《美麗人生》是一部以猶太人集中營經驗為本改編的電影，其情節或許虛構，但卻也具體展現出個人或群體對「過去」或「現在」意義之認知的社會性建構因素。再者，雖亞力士利用虛構新聞進行合理化解釋的場景，可被解讀為社會體制下東德對於人民的欺騙手法，但如本文前言所述，編導都強調此電影主要在於表現母子之愛，而非意在批判東德社會主義體制。

⁶⁰ Pierre Nora,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18-24. 阿博瓦胥有關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追憶似水年華》的研究中，其實已注意到社會記憶建構中的物

《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藉以探究現代法國國族認同建構的歷史。⁶¹在該書中，諾哈將此研究取向視為「通往另一種歷史的道路」，既不在於研究「事件本身」，也不在於探究往事「如何發生」，而是在於瞭解「過去」的意義認知，如何在時間之流中不斷重新再建構，並持續被利用、應用、誤用與影響。⁶²如此，諾哈指出了「記憶所繫之處」的政治意義。

《再見列寧》的劇情鋪陳與亞力士建構的「東德」，都出現許多象徵東德的「記憶所繫之處」。首先，我們常看到具功能性與象徵性的東德場所、建築與器物，如布蘭登堡門、柏林電視塔、亞歷山大廣場、世界鐘、列寧雕像、新崗哨、渡假小屋、P2國宅公寓與托笨車等。其次，在亞力士的「東德」中，除了具懷舊感的床鋪、書桌、書架與格瓦拉照片之外，也置入許多日常生活用品，例如斯博特醃瓜與金摩卡咖啡粉等。即便這些用品在「轉折」現實中倍受東德人鄙棄或不易取得，亞力士仍設法在東德舊商品包裝中，填入西德或西方商品，以假亂真，甚至在棄置的東德公寓⁶³中找到「卡達卡紅酒」(Rosenthal Kadarka)、「金摩卡」與「可羅布綠碗豆」(Globus Green Peas)等貨真價實的東德商品，作為母親的生日禮物。這些東德「記憶所繫之處」，成為亞力士建構其「東德」空間中的重要物質性元素。

除了物質性記憶媒介之外，亞力士也利用儀式性「身體實踐」來營造他的「東德」空間。在《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書中，霍布斯邦以「發明傳統」(inventing traditions)為視角探討社群儀式之形成、性質、類型、功能及其與認同建構的關係。⁶⁴尤其，「被發明的傳統」最重要

質性與空間性因素，雖然其論證未如諾哈和艾斯曼等後世學者的系統性說明清楚。參見Maurice Halbwachs, "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60.

⁶¹ 戴麗娟與諾哈合作，選擇法文版《記憶所繫之處》若干篇章譯成中文，並收錄於中文版的《記憶所繫之處》一書，參見Pierre Nora編，《記憶所繫之處》。

⁶² Pierre Nora編，《記憶所繫之處》，頁18-19。

⁶³ 1989年夏天，改革派當權的匈牙利政府拆除了與奧地利的邊境，並取消東德人前往西方的簽證限制，導致當年八月到匈牙利旅行的22萬名東德人中的十分之一趁機投奔，後續在「德國人在西德土地上的團聚」的媒體效應之下，引起一連串投奔西方尋求政治庇護的效應。在此效應之下，東德自然出現許多棄置的住家。參閱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243-244.

⁶⁴ 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的功能，在於透過不斷重複展演的儀式性與象徵性身體實踐，創造社群共享過去的歷史感，進而藉之建構社群認同。⁶⁵在《社會如何記憶》(*How Societies Remember*)中，康諾頓也清楚論證，具重複性與形式性的社群儀式，是保存與傳遞群體記憶的重要媒介。⁶⁶例如每年在固定日期、時間進行家族祭祖與誦讀祭文的家祠活動，或如抗日戰爭勝利、二二八事件、鄭南榕逝世週年紀念。而具重複性與形式性儀式活動之主要功能，則在於喚醒、維持與凝聚群體記憶與集體認同，因此具有高度社會動員與政治意涵。總之，重複性、形式性與政治性群體「身體實踐」，是維繫群體休戚與共之歷史感與認同感的儀式性基礎。

《再見列寧》中的克莉絲汀生日會與逝世紀念儀式，便與克莉絲汀個人與群體記憶之喚起與認同之維繫息息相關。由於克莉絲汀甦醒後有失憶症狀，常因想不起過去或時序錯亂，而對當下感到迷惘。在亞力士策劃的生日會中，除了邀請母親熟悉的親人、鄰居、同事與學生等社群成員之外，還安排「少年先鋒隊」歌唱「我們的祖國」，讓她藉此喚起共享記憶，進而確定她的社群身份認同。例如，在歌唱「我們的祖國」時，克莉絲汀出現指揮的姿態，貌似回到過去，如她所言：「是我們教你們唱的，對吧？」(*GBL*, 56:40)其次，透過昔日領導的生日賀辭，再次確認她在同事間的「模範」地位。昔日領導贈送的生日禮，也出現諸如卡達卡紅酒、金摩卡、可羅布綠碗豆等克莉絲汀喜愛的東德食品。在亞力士的致辭當中，克莉絲汀再度確認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及其與社群成員的依附關係，如亞力士所言：「妳是全世界的老媽，我們每個人都愛你。」(*GBL*, 1:00:27)此外，我們也從亞力士致辭得知，克莉絲汀生日會往年都舉行，且固定在莫斯科咖啡廳(Café

1-14.

⁶⁵ 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9.

⁶⁶ 所謂重複性，意指週期不斷重演的「身體實踐」得以確保社群記憶維持具特定意義之人、事、物的記憶，進而世世代代傳遞，以凝聚群體認同。形式性指重複性儀式之日期、地點、流程與口號，通常較為固定不會輕易改變。參閱Paul Connerton,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1-71; 有關康諾頓對於紀念性與儀式性「身體實踐」和社群認同建構關係之詳細學理探討與說明，也可參閱潘宗億，〈瑪德萊娜時刻：以戰後臺灣飲食書寫中的食物記憶為例〉，《中國飲食文化》，第12卷第1期（臺北，2016.04），頁91-176。

Moscow)。家族新成員拉荷和韓納，也在生日會中被介紹給其所屬社群，成為社群一員。換言之，亞力士安排的生日會依計畫、流程進行，依序出現的歌唱、致辭、送禮儀式，一一喚醒克莉絲汀往日回憶並確認其身份認同。

《再見列寧》中的逝世紀念式，在社群成員見證下，亞力士母親的骨灰在燦爛煙花中隨風而逝，標示克莉絲汀個人生命之死，象徵東德之逝，同時也如開國大典般寓言德國歷史新頁之始。雖克莉絲汀不在人世，東德也正式走入歷史，但都會永存於儀式參與者的記憶，正如亞力士結語所言：

如今她在天上某個角落，或許正低頭望著我們，不過是地球表面上的一粒沙，如同席格蒙的星際之旅，媽腦海中的祖國是她堅信的，這烏托邦守護母親直到最後。一個壓根不存在的國家，一個在我的回憶中永遠與我母親身影相繫的國家。(GBL, 1:52:10)

如此，如高掛天空列寧雕像的揮別姿態，東德「烏托邦」正式消亡，但卻永存人心。

然而，這些物質性與儀式性「記憶所繫之處」，必須在特定「空間」脈絡中才具有意義。換言之，《再見列寧》中再現的東德記憶媒介，與亞力士建構的想像性「東德」空間之間，具密切關係。為論證此點，本文以下將亞力士的「東德」定義為一想像性社會空間，藉之探析「空間的生產」性質，及其與社群記憶和認同建構的關係。運用拉費佛賀(Henri Lefebvre, 1901-1991)的概念，本文將亞力士建構「東德」的歷程，定義為「空間的生產」，亦即社群透過社會實踐，複製主流或另類論述，以賦予空間或地方意義的過程。⁶⁷在此過程中，任何社群經由特定空間之「佔據」與「使用」，透過儀式與示威等身體實踐，植入主宰或另類論述，以此賦予該空間社群性意義，從中界定適所與不適所、「我者」與「他者」身份之界限。因此，空間意義乃隨不同社群之「佔據」與「使用」，不斷流變。⁶⁸換言之，在空間的建構過程中，社群藉由植入空間論述，藉以宣稱與建構群體認同，定義特定空間內為「我者」，特定空間之外為「他者」，是為空間性認同建構。⁶⁹

⁶⁷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⁶⁸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27-29, 35-38.

⁶⁹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29-34. 中國二十世紀1976年的四五運動與1989年的六四運動期間的天安門廣場，以及臺北新公園之於同性戀社群的認同建

其中關鍵在於，群體透過主流或另類論述書寫，將群體共享的記憶或歷史感，植入或「安置」在空間之中，如此形成共享的地方感，構成社群認同的基礎。例如，紀念碑、博物館、文物保存與史蹟界定，都是將官方主流歷史論述「安置」於空間或地方的例證。⁷⁰由此，空間之生產與記憶、認同建構的關係，於焉形成。提爾(Karen Till)則進一步指出，空間、記憶與認同關係的政治意涵，亦即社會記憶之建構，是「社會群體相互競逐取得再現其詮釋過去之版本的權威性，以合法化其政治目的與認同的動態歷程」，⁷¹透過空間的佔據與使用，植入「再現其詮釋過去之版本」，是取得歷史詮釋權與建構群體認同的方式。⁷²綜合上述，我們看到空間之生產、論述之生產與記憶和認同建構之間的辯證關係。

亞力士的「東德」具體呈現空間生產、論述生產與記憶和認同建構的辯證關係。首先，東德消亡之後，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隨之崩解，西德政治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文化，成為新德國主宰性論述核心。然而，為使母親能以社會主義者身份繼續生存，亞力士透過物質性與儀式性「記憶所繫之處」的運用，構築一個想像性「東德」空間，並在該「博物館化」空間內，置入異於現實主宰論述的另類歷史詮釋版本。⁷³在亞力士建構的「東德」中，克莉絲汀藉由亞力士置入的東德日常生活用品與儀式性活動，喚醒並維持她的記憶與身份認同。同時，亞力士置入的另類歷史詮釋版本，則構成該空間意義與「地方感」的基礎，成為克莉絲汀建構其過去歷史與現在意義認知的「來源」，是為該空間的主宰性論述。因此，每當該空間中

構，均屬此例。參閱潘宗德，〈浮現北京城的時間中軸線：中國首都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及其意義變遷〉，頁345-399；王志弘，〈臺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2期(臺北，1996.04)，頁195-218。

⁷⁰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81-85.

⁷¹ Karen Till, "Places of Memory," in J. Agnew, K. Mitchell, G. O'Tuathail, ed.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2003), 289.

⁷² Karen Till, "Places of Memory," 289-290.

⁷³ 博物館化這裡指「懷舊東德」中興起之以博物館展示東德日常生活與物質文化的風潮，參閱Andreas Böhn, "Memory, Musealization and Alternative History in Michael Kleberg's Novel *Ein Garten in Norden* and Wolfgang Becker's Film *Good Bye, Lenin!*," 253; Timothy Barney, "When We Was Red: Good Bye Lenin! And Nostalgia for the 'Everyday GDR'," 134.

出現和主流論述衝突的不尋常或「不適所」現象時，亞力士便以虛構新聞的方式，賦予這些現象符合該空間的「適所」意義。為讓母親維持其身份認同，免於現實的致命傷害，亞力士建構了一個具有「地方感」的「東德」空間，從中「安置」各種記憶媒介「再現其詮釋過去之版本」，得以同時維持母親的生物性與社會性存在。

如果亞力士在「東德」中所「安置」的另類歷史書寫是主宰性論述，作為再現「懷舊東德」的《再見列寧》，則可被視為一個被「安置」另類書寫的社會性空間。換言之，《再見列寧》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性空間，透過東德日常生活與物質文化之再現，書寫不同於主流論述的另類歷史詮釋，以作為德東人身份認同建構的基礎。同理，「懷舊東德」風潮中，德東人透過東德商品之使用與消費，生產一個想像性社會空間，並在該空間置入另類東德歷史詮釋版本，從中建構其群體認同。總之，《再見列寧》不僅同時再現了兩德統一歷程與「懷舊東德」現象，也展示了群體記憶與認同建構之物質性、儀式性與空間性，更藉由亞力士的「東德」白色謊言，寄託了兩德統一與東德史另類歷史詮釋，成為「懷舊東德」風潮中德東人建構認同的一個社會性空間。

四、「懷舊東德」之脈絡化

然而，為何德東人會出現從西德商品消費熱到「懷舊東德」的激烈變化呢？下文在艾斯曼的「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⁷⁴分析框架下，跳脫歷史記憶學理性討論，進入「懷舊東德」的歷史脈絡，期從中說明《再見列寧》作為傳遞東德與「懷舊東德」記憶媒介的意義，並進而提出新的詮釋觀點。

根據艾斯曼，「文化記憶」指涉人類群體記憶得以跨世代、跨社群流傳

⁷⁴ Jan Assmann and John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65 (1995), 125-133; Jan Assmann, "Introduction: What is Cultural Memory,"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 Ten Stud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0; Jan Assmann, 〈昨日重現——媒介與社會記憶〉，《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頁21-42。

的物質與空間基礎。在阿博瓦胥的社會記憶概念基礎上，艾斯曼進一步區別短時間「溝通記憶」(communicative memory)與長時段「文化記憶」。「溝通記憶」意指社群透過日常口語溝通與口述傳統形式傳遞過去知識與認知的記憶形式，其傳遞範圍以社群內部成員為主，有效性在三至四代之間。因此，該社群記憶若欲跨越世代或社群範疇之侷限，必須轉化成「文化媒介」(cultural media)形式承載的「文化記憶」。⁷⁵亦即，社群記憶從「溝通記憶」轉化成諸如文本論述、文藝創作、儀式實踐、紀念建築、城市空間與景觀等「文化媒介」，便得以跨社群長時期傳遞、維持與再創造。⁷⁶此一過程，涉及社群對過去知識與意義認知之視覺化、儀式化、物質化與空間化，例如官文書、歷史教科書、文本論述、日記、回憶錄、小說、繪畫、照片、電影、電視、身體實踐(儀式、服飾與社會抗爭)、紀念性建築與空間(博物館、紀念館、紀念公園)等「文化媒介」。艾斯曼除了在概念上區別「溝通記憶」與「文化記憶」兩種記憶形式之外，更進一步指出「文化媒介」的建構，其實就是「認同的具體化」(concretion of identity)。⁷⁷本文進一步認為，凡此「認同的具體化」之背後，勢必具有主宰性論述或非主流另類論述之基礎。換言之，「文化媒介」形式的群體記憶，其實就是官方或非主流論述的「具體化」或「物質化」結果。

艾斯曼的「文化記憶」概念，是本文將《再見列寧》定義為「懷舊東德」現象與東德日常生活經驗之「文化記憶」媒介的學理基礎。如前文所述，《再見列寧》出現許多象徵東德國族與日常生活的「記憶所繫之處」，成為再現東德的「文化媒介」。其中，支撐亞力士建構「東德」空間的「文化媒介」，包括紀念性建築與城市空間、日常生活器物與商品(如托笨車)、視覺性文化生產品(如新聞影片)，以及儀式性身體實踐(生日與死亡紀念會)，便是亞力士另類東德歷史書寫的「具體化」結果。就是在此意義上，《再見列寧》可視為物質化東德消費文化的「文化」媒介，亦即「文化記憶」媒介。《再見列寧》作為二十一世紀初的視覺性文化生產品，不但再現「對

⁷⁵ Assmann and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126-129.

⁷⁶ Assmann and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128-129.

⁷⁷ Assmann and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128.

失落的東德文化的哀悼」，同時也喚起德東人昔日商品風尚的社群記憶。⁷⁸下一步，本文將檢視「懷舊東德」的歷史發展脈絡，並對照《再見列寧》之解讀，進一步論證《再見列寧》作為「懷舊東德」之「文化記憶」媒介的歷史性質，同時解答為何「懷舊東德」以東德商品消費作為其表現形式。

在「轉折」後的1990年代中期，德東人形成一股憧憬、重現與消費東德物質文化與商品的風潮。之前，德東人展現的卻是對西德商品趨之若鶩的狂熱。此一狂熱，部分源於德東人在統一前長期處於商品消費挫折與對西德商品的渴望，終於在邊界開放下獲得解放。此一西德商品消費熱潮下，如《再見列寧》所呈現，東德商店搖身一變成西德商品消費天堂，東德電視機、收音機、傢俱與衣服因而被棄置街頭。一位德東婦女表示，即便少數人仍想使用東德商品，但「根本沒有東德產品可以購買」，因為「所有來自東德產品都突然消失了」。⁷⁹在西德商品消費熱下，東德商品甚至變成羞恥的象徵，例如東德國民車拖笨車，成為德西人日常生活中嘲笑的對象。⁸⁰然而，在統一蜜月期後，德東人反而表現出對前東德商品的狂熱。誠如《再見列寧》中亞力士瘋狂尋找東德日常生活用品的情節所呈現，原本被視為挫折與羞恥感來源，並遭到棄置的前東德商品，反而成為懷舊的對象。

「懷舊東德」現象在兩德統一後兩年逐漸浮現，並於1990年代中期擴大為普遍的風潮。1992年左右，東德邊境村落婦女重新穿上象徵東德勞動女性的工作服(kittel)，也開始再度使用東德「Spee清潔劑」；同一村落的年輕人，則開始飲用東德「維他可樂」(Vita Cola)與啤酒；一個德東家庭，甚至選擇駕駛象徵落後的拖笨車，前往和德西親戚聚餐。⁸¹到1990年代中，「懷舊東德」現象擴展到社會各層面，具體呈現在東德物質文化的重現與商品

⁷⁸ Daphne Berdahl, "Goodbye Lenin, Aufwiedersehen GDR: On the Social Life of Socialism," 126; Andreas Böhn, "Memory, Musealization and Alternative History in Michael Kleeberg's Novel Ein Garten in Norden and Wolfgang Becker's Film Good Bye, Lenin!," 246; Jennifer M. Kapczynski, "Negotiating Nostalgia," 84.

⁷⁹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3-194.

⁸⁰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34-735, 741-742; Daphne Berdahl, "Go, Trabi Go!," 64.

⁸¹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7.

消費上。眾多商品之中，以拖笨車最具代表性，不僅熱銷，其形象與符號也不斷再製，出現在明信片、紙牌遊戲、網站與潮T等商品上，甚至成為郵票圖案，德東地區甚至出現粉絲俱樂部，並發行拖笨車新聞通訊刊物。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拖笨車不再是落後的象徵。⁸²

拖笨車以外的東德日常生活商品，也找到生命第二春。除了上述「維他可樂」和Spee清潔用品Imi和Ata之外，斯博特醃瓜、金摩卡咖啡粉、卡達卡紅酒、可羅布綠碗豆、Radeburger啤酒、Rotkäppchen香檳、Bautzner芥末、F6香菸，以及具東德風格的服飾與制服等，均成為消費對象，其中部分可見諸《再見列寧》。東德商品消費熱下，甚至出現專門販售德東產品的賣場。⁸³再者，消費東德現象也擴及文藝領域。許多東德搖滾音樂與社會主義文學作品再度出現在市場上，專門放映前東德電影的戲院也紛紛出籠。⁸⁴其他類似的文化生產品，包括郵票、明信片、笑話集、潮T，甚至類似《東德產品小百科》的商品介紹書籍，都成為消費對象。⁸⁵

「懷舊東德」風潮下，德國人進一步開發出嶄新的「懷舊東德」產品。許多營業場所，在空間設計或服務上，均以再現東德日常生活為賣點。例如，一家東柏林舞廳，不僅提供東德飲料和音樂，還以昔日標準收費；一個名為「局外人」(Mauerblümchen)的懷舊咖啡館，以社會主義時期物品裝飾，也以昔日收費標準提供服務；⁸⁶原東德邊界海關被改建成「眼淚殿堂」(Tränenpalast)夜總會；Frank Georgi⁸⁷甚至提議在昔日何內克的核子避難所地

⁸² Catherine C. Fraser and Dierk O. Hoffmann, *Pop Culture Germany! Media, Arts, and Lifestyle* (Oxford: ABC Clio, 2006), 19; Martin Blum, "Remaking the East German Past," 229-230;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42; Daphne Berdahl, "Go, Trabi Go!," 64-66.

⁸³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7.

⁸⁴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42;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7.

⁸⁵ Martin Blum, "Remaking the East German Past," 244-245;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8.

⁸⁶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7.

⁸⁷ Frank Georgi時為主要從事音樂會策劃的商人，出生於前東德地區，1989年夏天經由布拉格逃亡至西德，兩德統一後於1993年提議在東柏林興建「東方公園」主題樂園。

點附近，開設「東方公園」(Ossi Park)主題樂園，嘗試利用圍牆、鐵絲網、拖笨車、東德馬克、廁紙等，以及國家安全部幹員與黑市等意象，讓消費者重溫社會主義時代的「慘淡舊時光」(schlechten alten Zeiten)。⁸⁸德國遊戲設計產業，也發展出販賣東德日常生活史知識的產品。例如，兩位東柏林大學生設計了一款呈現46種東德食品的紙牌遊戲，並模仿西德香菸品牌「西方」(West)的廣告口號「品味西方」(Kost the West)，將產品命名為「品味東方」(Kost the Ost)。此一紙牌遊戲於1996年末上市，第一週便賣出十萬套。⁸⁹又如，以東德政治口號命名的「遙遙領先」(Überholen ohne Einzuholen)桌遊，玩家必須設法收集一臺托笨車、一台電話機與統一社會黨黨證，最後抵達目的地，也就是統一社會黨領導居住的萬德利茲(Wandlitz)，便成為贏家。另一套「遠東」(Ferner Osten)的桌遊，則需分組回答有關東德日常生活細節的問題。⁹⁰另外，在音樂產業上也出現由德東人組成的搖滾樂團「德國戰車」(Rammstein, 1994)，創作以東德為主題的懷舊音樂。⁹¹值得注意，東德交通號誌「小綠人」(Ampelmännchen)，甚至成為德東人認同的象徵，甚至是文物保存的資產。⁹²由於消費東德已成為一個可獲利的產業，德西資本家、電視傳播業者與文藝創作者，也開始投入「懷舊東德」產業的行列，出現東德日常生活「博物館化」的趨勢。⁹³綜上所述，作為投射德東人懷舊情懷的東德

參閱“Stalins Rache: Ein Berliner Konzertveranstalter will, hinter Mauer und Stacheldraht, eine Mini-DDR bauen; Ossi-Park,” *Der Spiegel* 42(Oct. 1993): 88-89.

⁸⁸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42.

⁸⁹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7; Martin Blum, “Remaking the East German Past,” 243-244.

⁹⁰ Martin Blum, “Remaking the East German Past,” 244;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8.

⁹¹ John T. Littlejohn and Michael T. Putnam, “Rammstein and Ostalgie: Longing for Yesteryear,” *Popular Music and Society*, 33: 1 (Feb. 2010), 35-44.

⁹² Catherine C. Fraser and Dierk O. Hoffmann, *Pop Culture Germany!*, 19; M. Duckenfield and N. Calhoun,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Ampelmännchen,” *German Politics*, 6:3 (1997), 54-69; Patricia Hogwood, “Identity in the Former GDR: Expression of ‘Ostalgia’ and ‘Ossi’ Pride in United Germany,” 76;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42.

⁹³ Silke Arnold Simine, “Themepark GDR?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Memory in post-Wende Museum, Literature and Films,” in Christian Emded and David Midgley, eds. *The Fragile Tradition: The German Cultural Imagination since 1500. I: Cultural Mem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xford: Peter Lang, 2004), 253-277; Andreas Böhn,

物質文化與商品，在「轉折」後新的社會文化脈絡下，找到生命第二春。在此歷程中，德東人的懷舊情懷經歷「商品化」，甚至創造出具嶄新意義的產品。此一懷舊商品化的現象，也再現於《再見列寧》之中。例如，假扮「少年先鋒隊」的青少年，因可賺取演出費用，因而三番兩次不請自來，到克莉絲汀房間中演唱「我們的祖國」。

「懷舊東德」現象的出現，有其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脈絡因素。首先，它是德東民眾消費西德商品挫折感的反作用力結果。雖兩德邊界開放意味東德人可輕易取得長期渴望的西德商品，但並不意味負擔得起。商品價格昂貴，加上德西人更勝一籌的消費力，反而突顯德東與德西人之間的差異。因此，西方商品消費經驗導致的失落感，反而讓德東人對昔日商品產生懷舊感。不僅如此，德東地區在統一歷程中產生的經濟衰退(如工業生產衰退百分之40)與逼近百分之40的失業率，深化德東人的失落感與「二等公民」的自我認知。⁹⁴因此，「懷舊東德」實際上部分是德東人面對商品消費挫折與資本主義生活困境，不得不逃避而寄情於東德商品。⁹⁵在經濟生活上的失落，使德東人開始對東德商品產生懷舊認同感，因為這些東德「記憶所繫之處」，讓他們回想到貧乏但卻穩定的社會主義生活。

“Memory, Musealization and Alternative History in Michael Kleeberg’s Novel *Ein Garten in Norden* and Wolfgang Becker’s Film *Good Bye, Lenin!*,” 245;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3.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集中探討前東德人的「懷舊東德」現象，至於西德人的「懷舊東德」現象及其意義僅能另文處理。這裡只須提及，西德人的「懷舊東德」現象，其實是「懷舊西德」(Westalgie)的表現形式。關於此，可參閱Florian Illies, *Generation Golf* (Berlin: Argon, 2000); Paul Betts, “Remembrance of Thing Past: Nostalgia in West and East Germany, 1980-2000,” in Paul Betts and Greg Eghigian, eds. *Pain and Prosperity: Reconsidering Twentieth-Century Germ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8-207;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141-171.

⁹⁴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249-251; Andreas Huyssen, *Twilight Memories: Mar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69; Patricia Hogwood, “Identity in the Former GDR: Expression of ‘Ostalgia’ and ‘Ossi’ Pride in United Germany,” in Paul Kennedy, ed.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Crisis or Opportunity* (New York: Palgrave, 2001), 66. 關於統一之後德東地區的失業率狀況，詳參Thomas Lange and Geoffrey Pugh, *The Economics of German Un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1998), 92-110.

⁹⁵ Martin Blum, “Remaking the East German Past,” 230.

其次，德東人在兩德統一過程中萌生的政治悲觀主義，也是「懷舊東德」現象的原因。兩德統一由強勢的西德柯爾(Helmut Kohl)政府主導，幾乎照著「十點方案」進行。⁹⁶在柯爾政府將東德整合到西德政治與經濟自由主義體系的主宰性論述下，東德政府的反對意見，或知識分子提出的東德自治「第三條道路」，完全遭到忽視。東德以新德東五邦名義「併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亦即原西德)，讓德東人感到兩德統一，不僅非對等統合，其實只是換了政治支配者。如此政治上的悲觀主義，加上經濟生活挫敗與失落，使德東人對東德的安穩生活更形懷念。

德東人的政治悲觀主義，被「去東德化」統一政策所造成的自我否定進一步強化。在「轉折」之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政經文教政策，完全被掃進歷史垃圾堆。學者曾比喻，東德商品在「轉折」之初的瘋狂「貶值」，其實正是東德「貶值」的結果。⁹⁷在西德強勢整合政策下，各層面都出現「去東德化」現象。例如，在工業與農業部門「私有化」政策下，不符現代標準的工廠被迫關閉，多數東德工廠與農場被迫廉價合併於西德企業，甚至有批評者認為這根本是把「東德人民的遺產」直接放棄給西德，最後導致德東的去工業化。⁹⁸另外，原東德高等教育、學術體系，也遭強勢重整或清算(*Abwicklung*)，如《再見列寧》中的克莉絲汀，四分之三的教師與研究員失去工作；學校、街道與公共建築被迫政治「改名」；許多具社會主義象徵意義的紀念碑與紀念堂，也因政治不正確而遭到拆除。⁹⁹此一「去東德化」的現象，被視覺再現於《再見列寧》中高掛天空的列寧雕像。在歷史現實中，東柏林列寧雕像確於1991年從新德國首都柏林景觀中被拔除，「具體化」了「去東德化」政策。¹⁰⁰在後極權時代，因與主流官方論述不合調，而被

⁹⁶ “Helmut Kohl’s Ten Point Plan for Overcoming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and Europe: Speech before the Bundestag,” *German Unific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59-60.

⁹⁷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5.

⁹⁸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3.

⁹⁹ Brian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148-153.

¹⁰⁰ Brian Ladd, *The Ghosts of Berlin*, 196-199; Dirk Verheyen, *United City, Divided Memories?*, 216-217;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5;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3.

掃進歷史垃圾堆的領袖雕像，列寧不是唯一，諸如史達林與蔣介石亦然。¹⁰¹總之，西德強勢主導統一的結果，造成東德政經文化價值的全面「貶值」，進而導致德東人的不滿、失落與挫折感，形成「二等公民」的自我認同。

此一因新德國統一政策產生的負面情緒，及其引發的「懷舊東德」情結，也具體再現於《再見列寧》之中。例如，因國營電視修理站的關閉，亞力士也暫時失業。其他年紀較高者，包括克莉絲汀在內的鄰居與同事，也都被迫退休。眼見亞力士在垃圾桶尋找斯博特醃瓜空瓶時，失業的年長鄰居開始抱怨統一後的高失業率，而其對現實的不滿與失落，也使他在克莉絲汀生日會上表示「希望事情能如昔日般正常運作」(GBL, 58:30)。「如昔日般正常運作」此一對東德生活的懷舊，也呈現在年長鄰居喜歡請克莉絲汀寫申訴書與敘舊的情節中。這些長者在離開亞力士的「東德」時，便經常感嘆「彷彿又回到從前」(GBL, 01:09:11)。不過，在樂於「轉折」的亞力士姐姐看來，他們的公寓卻變成了「過氣高齡黨員俱樂部」(GBL, 01:10:46)。本文認為，這些「高齡黨員」的心聲，體現了老世代面對兩德統一的負面態度。綜上所述，《再見列寧》除了再現德東人消費東德商品熱之外，也呈現統一後德東人油然而生的「懷舊東德」情懷。正是如此，本文將《再見列寧》視為承載「懷舊東德」情結的「文化記憶」媒介。

五、分裂的國族記憶：歷史情感之傷與知識分子之邊緣化

新德國官方東德史書寫，呈現選擇性強調「德意志統一社會黨」與「國家安全部」等黨國暴力之負面表述，忽略東德一般日常生活經驗。如此對東德史的「否定」傾向，更強化德東人自我貶抑為「二等公民」的身份認同。然而，這是以西德意識形態為核心價值的統一政策下的必然結果。作為國族記憶與遺忘表現形式的官方國史書寫，是形塑國族集體認同的根本。因此，為了建構新德國的內在統一性與國族認同，德國人勢必得面對、

¹⁰¹ Karen Till, "Post-Totalitarian Identity: Public Memory in Germany and Russia," with Benjamin Forest and Juliet Johnso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35 (2004), 357-380.

解釋導致兩德分治的歷史，尤其是納粹與統一社會黨獨裁極權統治的過去。納粹與統一社會黨政權的罪行，是現代德國國族創傷，也是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中難以逃避的「困難的遺產」(difficult heritage)¹⁰²。新德國處理創傷過去，或所謂的「超克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清理歷史」(Geschichtsaufarbeitung)，最終展現在新德國國史論述上，也「具體化」在首都柏林的「文化媒介」上。¹⁰³

為了將東德整合到以西德政經體制為基礎的新德國，並完成內在統一性之建構，「清理過往」(Aufarbeitung der Vergangenheit)，或所謂「清理東德

¹⁰² 此處「困難的遺產」一詞源自Sharon Macdonald闡述德國紐倫堡城市如何面對與處理納粹遺跡的提法，Sharon Macdonald,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相同的提法與論述觀點，另可參閱William Logan and Keir Reeves, ed. *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Dealing with 'Difficult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¹⁰³ 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since 1800*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7), 111-148, 167; Andreas Huyssen, *Twilight Memories*, esp. 67-73; Dirk Verheyen, *United City, Divided Memories?*, 1, 6-14; 137-198; Catherine C. Fraser and Dierk O. Hoffmann, *Pop Culture Germany!*, 29。關於兩德在二戰到統一前夕期間的國史論述非本文討論重點，限於篇幅，將不展開討論。但是，在這裡可簡單歸納幾個要點。首先，兩德在戰後建構其國族認同時，特意忽略國族因素，各自以其主宰性意識形態作為國族認同建構的基礎，東德以反法西斯(antifascism)意識形態建構一個與蘇聯同盟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西德則在西化發展中建構以民主與資本主義價值為核心的政治體制，並積極追求歐洲統合。其次，在冷戰時期，東、西德雖隸屬於不同意識形態，卻皆有意忽略納粹德國時期及其戰爭罪行，皆強調反納粹英雄或受害者的論述。再者，兩德選擇性記憶的國史論述，也具體化在東、西柏林的城市景觀之中。然而，必須強調，當東德政權在統一前主要皆以反法西斯主義為主宰性論述，西德方面在1960年代末至統一期間，隨著國際與內部政治之發展與變遷，逐漸揮別1950至1960年代中對於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的集體沉默，但其官方論述與國族認同之內涵，亦歷經數次變遷，更具體的討論，除了可見上引Stefan Berger所著*The Search for Normality*之外，亦可參閱Jeffrey Herf, *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Toward the Historikerstreit of the Mid-1980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Konrad H. Jarausch and Michael Geyer, *Shattered Past: Reconstructing German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潘宗億，〈全球首都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以北京天安門廣場與柏林「浩劫紀念碑」為中心的探討〉，收於梁景和主編，《社會文化史理論與方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104-144；周惠民，〈德國現代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臺北，2006.11)，頁233-257。

共產黨獨裁政權」(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成為當務之急，也是為轉型正義之一環。¹⁰⁴為了推動轉型正義，德國法庭在東德法律基礎上，審判邊境警衛與諸如「國家安全部」部長梅爾克(Erich Mielke, 1907-2000)和國家領導人何內克。何內克批評此乃「勝利者的正義」(Siegerjustiz)，是對失敗者的政治審判。此一觀點，某種程度落實德東人「二等公民」之觀感。¹⁰⁵其次，由於司法審判在完成轉型正義上的局限性，德國開始倡立類似南非「真相與調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的機制，來審視東德的黨國暴力與尋找歷史真相，以便調解加害者與受害者關係，達成德國內在統一性之建構。為鞏固民主，聯邦議會在1992年3月成立「東德統一社會黨獨裁政權時期歷史評價與影響真相調查委員會」(Enquete-Kommissionen zur "Aufarbeitung von Geschichte und Folgen der SED-Diktatur in Deutschland")對東德共黨政權進行歷史調查。論及委員會成立之必要性時，梅克爾(Markus Meckel, b. 1952)¹⁰⁶強調，正是東德歷史問題是全德社會的責任，因為它「屬於德國戰後的歷史」，也是「整個國家遺產的一部分。」¹⁰⁷最終，國會議員與學者組成委員會，經兩年調查、訪問與資料收集，最終出版十八冊達15,000頁文獻彙編，收錄會議、訪談與國會辯論、公聽會記錄與國會報告書。¹⁰⁸

在建構德國內在統一性方針下，報告書的東德史書寫呈現出相對化與去合法化的傾向。首先，報告書將東德類比於納粹政權，藉此與之劃清界線，並突顯新德國政權異於昔日獨裁政權，以便鞏固民主體制，強化反極權獨裁共識。如此，藉過去東德歷史來合理化新政權存在之必要，並維護

¹⁰⁴ 「清理過往」與「清理東德共產黨獨裁政權」二詞中譯皆採用花亦芬的翻譯：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先覺出版社，2016)，頁331。

¹⁰⁵ A. James McAdamas, *Judging the Past in Unified Germa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esp. 23-54;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29-34.

¹⁰⁶ 梅克爾曾擔任前東德外交部長，於1989年10月推動建立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in der DDR, SDP)，後於1990年9月和西德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合併。兩德統一之後，梅克爾成為德國聯邦議院議員，曾積極倡議真相調查委員會之成立。

¹⁰⁷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35.

¹⁰⁸ A. James McAdamas, *Judging the Past in Unified Germany*, 88-123; 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157-158;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34-37.

二戰以來深根於西德的民主化成果。此外，報告書希望透過歷史調查，確認加害者與受害者身份，以完成轉型正義，超克德國國族創傷，達成和解與統一。¹⁰⁹在此論述基調上，東德被類比為納粹，其結果便是東德歷史的去合法化。例如，報告書將東德形容為濫用「反法西斯」(antifascism)意識形態以合理化獨裁統治的政權，並指稱徒為意識形態包裝的反法西斯主義，讓東德逃避納粹的過去之餘，更導致1970年代右翼政治勢力的興起。¹¹⁰換言之，東德的反法西斯是失敗的實踐，對捍衛民主體制毫無貢獻。透過歷史書寫去合法化東德的過去，報告書意在映襯西德政權在統一過程中的正面貢獻，如此合理化以西德政經體制為基礎的統一政策。同時，報告書特別區別東德政府與人民，一方面突顯東德政權暴行，另一方面強調東德人民其實心向西德，所以最終高唱「我們是一個民族」(*Wir sind ein Volk*)，企求兩德統一。¹¹¹綜上所述，在否定東德歷史的合法性背後，意在突出西德政權與東德人民在邁向兩德統一歷程中所扮演的正面力量。

雖報告書聲稱意不在提供官方東德歷史書寫，但實際上卻反映新德國內在統一性的官方論述。選擇性書寫把東德史簡化成「統一社會黨」與「國家安全部」暴力史，甚至與納粹類比，並進一步落實在「去東德化」政策中。除前文已提及的街道、地方與紀念建築的改名，以及「法西斯」建築的拆除外，相同論述語言也「具體化」在1999年萊比錫開設的「現代史論壇」(Zeitgeschichtliches Forum Leipzig)等博物館中。¹¹²換言之，官方國史論述之「去東德化」，也「具體化」在各種「文化媒介」中，成為影響大眾的「文化記憶」。更要者，該論述聚焦東德高層政治，忽略一般民眾日常生活經驗，如此選擇性、簡化論述，加之本身已被去合法化、被否定之東德歷史的一部分，使德東人失落感與認同焦慮再次強化。誠如前東德歷史科學院

¹⁰⁹ A. James McAdamas, *Judging the Past in Unified Germany*, 88-123;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38-39, 42-43.

¹¹⁰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39-40. 另外，該報告書還指出社會主義時期的教會組織與東德政府，尤其是「國家安全部」的合作關係，參閱 A. James McAdamas, *Judging the Past in Unified Germany*, 92-101.

¹¹¹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41; 陳延輝，〈德國人國家認同〉，《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2卷第3期(臺北，2006.09)，頁106。

¹¹²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45.

(Institute for History, Academy of Sciences)主任施密特(Walter Schmidt, 1917-2000)所言：「假如那些在四十年當中曾做過或完成的事，都是無效或無用的，那些曾在東德工作的人們，便無法再維持他們的認同。若沒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我的認同是無法理解的。」¹¹³

自「轉折」以來，在新德國強調內在統一性的主宰性論述下，東德史研究也呈現選擇性書寫的特徵。¹¹⁴兩德統一後，東德史成為德國史學界最熱門和最具爭議性的領域，其整體特徵可歸納成四點。首先，在定義東德為獨裁政權的基礎上，統一社會黨與國家安全部等黨國暴力成為研究核心。此一東德史研究取向，也傾向於將東德政權類比為納粹，藉由納粹罪行的相對化，淡化其重要性，並將東德與納粹歸咎於共產主義與蘇聯政權。¹¹⁵其次，將焦點放在黨國暴力，難免造成對人民日常生活多樣性的忽略，除了簡化與標籤化之嫌，也流於扭曲、醜化、否定東德，造成德東人的不滿。再者，將東德國族認同簡化為反法西斯主義意識型態，忽略後者對人民日常生活的複雜影響，也傷害許多仍視反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為核心價值之德東人的歷史情感，對其國族認同想像造成影響，正如《再見列寧》所再現。¹¹⁶最後，對東德的否定與去合法化，甚至造成東德歷史學術體制本身的瓦解。統一前，東德歷史學術頗受西德歷史學社群正面評價，也深獲國際認同。但統一後，西德歷史學專業社群，突然稱東德歷史學家為統一社會黨政權提供服務，史學專業倫理有瑕疵。在此狀況下，隨高等教育與學術體制的重整，百分之95的東德高等教育工作者、百分之75的歷史研究

¹¹³ 轉引自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158-159.

¹¹⁴ Dirk Verheyen, *United City, Divided Memories?*, 11-12. 在此，本文無意涵蓋全部東、西德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爭論，僅根據學者Stefan Berger針對諸如Hans Günter Hockerts (1944-)、Michael Wolffsohn (1947-)、Eckhard Jesse (1948)、Klaus Schroeder (1949-)、Horst Möller (1943-)、Stefan Wolle (1950-)、Heinrich August Winkler (1938-)、Hans-Ulrich Thamer (1943-)等諸多政治立場之歷史學家的觀察，歸納新德國在東德歷史研究與詮釋上表現所出來的普遍特徵。關於這方面的討論，以及德國歷史學自二次大戰至兩德統一的發展，及其與國家認同建構之間的複雜關係，參見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21-55, 56-76, 77-108, 124-148; Andreas Huyssen, *Twilight Memories*, 67-84.

¹¹⁵ 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150-153, 208.

¹¹⁶ 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153-156.

員、百分之90的大學歷史教授失去工作。¹¹⁷如此情況，導致東德視角之東德史研究的邊緣化，無法與新德國史官方論述抗衡，並缺少東德日常生活的另類書寫。在此雙重邊緣化下，德東人發現，連作為他們身份認同一部分的「過去」，都遭否定。

最後，東德知識分子在兩德統一過程中政治與歷史論述的邊緣化，也是「懷舊東德」產生的重要原因。在統一變局中，東德知識分子並未發揮與論主導力量。¹¹⁸在「轉折」前後，他們「無法跟上事態節奏，並提出具說服力的分析」，總在「狀況外」，像地震儀故障無法測知地震一般，無法掌握人民的需求，而僅提出溫和漸進的社會主義改革等「第三條道路」主張，但完全為人民所忽視。¹¹⁹此一東德知識分子與群眾之間的疏離，可見諸《圖片報》(*Bild-Zeitung*)柏林圍牆倒塌週年的評論：「德國知識分子正站在角落，他們多數沒有體認到，今天是德國史上具重要意義的一天。」¹²⁰

東德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因「史塔西」(Stasi)檔案的公開，進一步惡化。簡稱「史塔西」的「國家安全部」留下許多秘密檔案資料，包括180公里長的檔案、100萬張圖片、20萬卷錄音帶、600萬張人名卡片。1990年統一之前，東德民選政府成立由前東德人權牧師高克(Joachim Gauck)負責的機構，即俗稱的「高克局」(Gauck-Behörde)，管理「史塔西」檔案。統一後，由聯邦議會製訂相關管理辦法，規範檔案調閱與使用。「史塔西」檔案公開後引起大眾關注，許多東德人前往調閱自己的檔案，且約十萬人被揭露曾擔任「史塔西」的「非編制內密告者」(*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這些東德政權「共犯」，不但在社會上遭受冷眼，甚至失去就業或升遷機會。他們之中，包括昔日甚具社會主義改革形象的知識分子、政治人物與教會人士，甚至連歷

¹¹⁷ 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159-163.

¹¹⁸ Robert von Hallberg, ed. *Literary Intellectual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ate: Professionalism and Conformity in the GD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John Torpey, *Intellectuals, Socialism and Dissent: The East German Opposition and Its Legac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Andreas Huyssen, *Twilight Memories*, esp. 37-66.

¹¹⁹ Andreas Huyssen, *Twilight Memories*, 38-39.

¹²⁰ Robert von Hallberg, ed. *Literary Intellectual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ate*, 5

史學家，都曾與「史塔西」秘密合作，擔任「非編製內密告者」。¹²¹其中，最具爭議性的公眾人士之一，就是小說家沃爾夫(Christa Wolf, 1929-2011)。在東德時期被視為異議分子的沃爾夫，曾以小說《所剩為何》(*Was bleibt*)描寫自己遭「史塔西」迫害與監視的經驗。然而，「史塔西」檔案卻顯示，她曾擔任「非編製內密告者」。¹²²諸如沃爾夫一樣的知識分子遍及各領域，完全失去人民信任，自然無法以東德社群代言人的身份，提出與官方論述抗衡的另類論述。是故，東德知識分子失敗與失信的雙重危機，使其陷於政治與論述上的邊緣化。¹²³

綜上所述，在新德國官方的統一政策與選擇性東德史論述下，在在突顯東德去合法化與被否定的遭遇，邊緣化的東德知識分子與歷史學家，在統一後也完全無法提出有效抗衡的東德視角論述。如此，在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等領域「去東德化」與邊緣化下，深感強烈剝奪感、失落感與自卑感的德東人，最終在歷史與現實結構性雙重否定下，使他們「二等公民」的自我認知一再深化，並明顯地表現在「我們(德東人)沒有離開家，卻已經移民」的名言之中。¹²⁴如此歷史情感之傷與生活現實困頓引發的雙重失落、否定與無奈，也清楚再現於《再見列寧》中亞力士對「轉折」歷程之另類詮釋、「東德」空間之建構與兩德統一意義的主體性定義之中。

在統一的德國，兩德雖「本是同根生」，但在分治時期的相異政經體制與國家認同所造成的差異，在統一後益趨明顯，形成「東德佬」(Ossis)與「西德佬」(Wessis)間的隔閡與衝突，導致德東人只能設法回歸昔日穩定生活中尋找其「穩定的身份認同」，難以達成「成長難分離」的期待。根據一項1990年的民意調查，大多數德東人咸認為，他們首先是德國人，然後才是德東

¹²¹ A. James McAdamas, *Judging the Past in Unified Germany*, 55-87; Dirk Verheyen, *United City, Divided Memories?*, 12-13;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254; Catherine C. Fraser and Dierk O. Hoffmann, *Pop Culture Germany!*, 24.

¹²² 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166; Andreas Huyssen, *Twilight Memories*, 49-60;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62-68;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46.

¹²³ 關於「史塔西」檔案之開放、管理與影響，可參閱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頁331-389。

¹²⁴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202.

人。然而，1994年的調查，卻呈現完全相反結果。¹²⁵一項1996年民調顯示，只有百分之6的德東人和百分之14的德西人認為兩者關係良好，其中高達百分之68德東人認為德西人應為雙方的衝突負責。¹²⁶在1999年，高達百分之74的德東人「相當」或「強烈」認同自己是東德人，到2001年則已經上升到百分之80。¹²⁷學者指出，到了2001年，仍有百分之57的德國人認為德東與德西人存在明顯差異。¹²⁸兩德統一二十週年前夕，《每日新聞》(*Die Tageszeitung*)民調顯示，在柏林左派政黨支持者中，百分之75認為東德佬與西德佬之間存在著無形的柏林圍牆，實屬合理。¹²⁹換言之，兩德統一後，德東人自我認同反而益形明顯，誠如「史塔西」檔案管理機構的負責人高克所言：「兩德統一後，我覺得我絕對是個德東人。」¹³⁰總之，兩德統一以來至二十世紀初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的危機狀態中，在東德知識分子與歷史學家的雙重邊緣化下，如《再見列寧》所寓意，德東人似乎只能寄情昔日物質文化與商品，尋找為自己「過去」發聲與為其社群建構認同歸屬的可能。凡此種種，說明至21世紀初，新德國國族認同危機狀態仍持續惡化。

六、東德消費文化及其意義變遷

在德東人國族認同危機狀態下，社會主義時期日常生活「文化媒介」的消費，成為德東人寄託「懷舊東德」與書寫另類東德史的「文化記憶」媒介。但是，我們又將如何理解原本讓東德人感到失望與羞恥的社會主義商品，何以轉化為「懷舊東德」寄託對象的意義變遷呢？亦即，社會主義

¹²⁵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7.

¹²⁶ R. Rose and Page E., "German Responses to Regime Change: Culture, Class, economy or contex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 1 (1996), 5, 23.

¹²⁷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253; Toralf Staud, "Ossis and Tüken: In Gesamt-Westdeutschland sind die Ostdeutschen Einwanderer," 9; Andreas Böhn, "Memory, Musealization and Alternative History in Michael Kleeberg's Novel Ein Garten in Norden and Wolfgang Becker's Film Good Bye, Lenin!," 256.

¹²⁸ 陳延輝，〈德國人國家認同的建構〉，頁106。

¹²⁹ 方清月，〈經濟又好轉，德東人大舉回流〉，

<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2/4309>, accessed on April 15th, 2014.

¹³⁰ Paul Cooke,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7.

時期商品的意義，在統一後為何會產生如此激烈轉變？如此意義轉變，或可從物質文化與事物生命史角度來理解。在此探討視角之下，「懷舊東德」商品可被理解為觀察德東人消費心態的指標，視為具特殊意義的物品，並當作日常生活經驗的文本加以解讀，因為物質文化是一個可被解讀的符號系統，而消費文化則是社會符號網絡，讓論者得以探析其社會意識形態基礎。¹³¹誠如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 b. 1949)在《物的社會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中所揭示，人類群體常隨時代賦予事物不同的編碼與意義，而事物則反映其社會脈絡。亦即，人類群體隨著社會變遷，會賦予事物不同的編碼與意義。¹³²同理，如《再見列寧》所呈現，東德商品在「懷舊東德」風尚下，隨著兩德統一後的社會變遷，也被賦予新的編碼與意義。以下藉由檢視東德消費文化發展脈絡，及其產品意義在兩德統一前後的變化，可以探析東德商品之所以成為德東人訴諸其反抗記憶與認同建構空間的物質性因素。

要從歷史的角度解答東德商品意義的轉變，必須檢視1960年代以來東德商品生產與消費文化的發展特徵。在「懷舊東德」風潮中，德東人憧憬的並非整個社會主義時期，而主要是1960年代以來的商品生產與消費文化。在許多德東人的認知中，1960年代是介於物資缺乏的1950年代、經濟衰退的1970年代，與政治不滿的1980年代之間光明而具希望的黃金年代(good old days)。¹³³在1960年代，政治局勢逐漸穩定，東德進行工業現代化改革，成就「經濟奇蹟」，成為東歐共產陣營首善國家，甚至名列世界十大工業生產國與十二大貿易國。¹³⁴尤其，由於意識到滿足勞工階級物質生活的

¹³¹ Alon Confino, "Consumer Culture is in Need of Attention," in Scott Denham, Irene Kacandes, and Ionathan Petropoulos, ed. *A User's Guide to German Cultural Stud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 181-188; Martin Blum, "Remaking the East German Past," 231-233.

¹³² Arjun Appadurai,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5.

¹³³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235-243;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46.

¹³⁴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236-237;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46-747.

重要性，東德當局致力發展民生工業，因此經歷商品生產與市場價格等方面之革新，建立現代化的消費文化。雖與西方相較下，東德商品仍略遜一籌，但在民生工業生產水準提升後，至少可滿足國內部分消費需求，洗衣機、電冰箱、收音機、傢俱與汽車等商品，變得相對容易購得。¹³⁵許多出現在《再見列寧》的「懷舊東德」商品，便是從1960年開始生產，例如前文提及的P2公寓與601拖笨車。

然而，1960年代的東德商品並非毫無瑕疵。相較於西方，東德產品在生產品質、速度與革新性等方面，均顯落後。民生用品產能不足，無法及時滿足市場需求，時常缺貨與長時間等待訂購商品，成為東德消費文化的特色。¹³⁶例如，東德人最長甚至需等上15年，才能取得訂購的601拖笨車。除品質低落外，因缺乏品牌競爭意識，東德商品選擇性少，缺乏變化。例如，601拖笨車在1960年代到統一前，幾乎沒有任何改變。¹³⁷產品缺乏變化的特性，也展現在包裝上。相較於西方，1960年代東德商品包裝較為單調與缺乏色彩、形式變化。根據東德1964年頒布的市場行銷指導原則，只有符合社會主義美學，商品包裝才可印上廣告文案，這對後來的發展影響深遠，使東德商品包裝與行銷缺乏革新。例如普遍使用的“Florena”、“Imi”、“Ata”與“Spee”等產品包裝，即呈現出1960年代以來的特徵：簡單的圖案與文案，僅列出品牌、用途、價格與訂購編碼等內容；由於印刷技術落後，包裝僅限兩、三種顏色；原料與先進包裝產業缺乏，致使包裝形式簡單、缺少變化，脆弱材質也使商品內容容易受污損。¹³⁸總之，東德商品呈現出品質低落、產能緩慢、缺乏變化與選擇性少等特徵。

東德商品的特徵，可見諸「轉折」初西德商品消費熱的德東人認知上。例如，一個受訪者談到拖笨車時笑稱：「我們以前總說馬克思主義如果有用，它一定不適用於汽車製造上。」¹³⁹談到拖笨車款的缺乏變化，一位德

¹³⁵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47-749, 751.

¹³⁶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48, 756.

¹³⁷ Daphne Berdahl, “Go, Trabi Go!,” 61.

¹³⁸ Martin Blum, “Remaking the East German Past,” 238-240.

¹³⁹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5.

東婦女表示：「我們在西德電視看到他們的車年年都有新款，而我們的托笨車卻仍然一成不變。」¹⁴⁰拖笨車甚至被拿來與西德賓士或寶馬比較，象徵東德工業生產不夠現代化、缺乏效率、落後與劣質，成為德西人茶餘飯後的笑料。¹⁴¹拖笨車是配備輸出功率差的二衝程循環引擎小型車，外殼由玻璃纖維和壓棉構成，和速度快、堅固的西德賓士和寶馬相較下，優劣立判。美國史家達頓(Robert Darnton)便利用此一對比，形容兩德之間的差異：「一個非常現代、耐操、速度快，另一個則落伍、沒有效率、可笑、速度慢。」¹⁴²總之，相較於西方，東德商品形式或品質顯得一成不變。因此，在德東人認知裡，品質低落、產能緩慢與缺乏變化、選擇性少，確是東德商品主要特徵，是兩德差異的主要指標。

德東人在「轉折」前後對東德商品的認知，也呈現在《再見列寧》三個角色的三種態度中。¹⁴³其中，亞力士姐姐體現了德東人對前東德劣質品的輕蔑與不滿。例如，當亞力士要求她換上東德服飾時，姐姐不屑地表示：「看我們以前穿的爛貨」。當亞力士讓姪女穿東德尿布時，姐姐也氣得暴跳如雷。亞力士姐姐對東德商品的負面態度，說明她在克莉絲汀沈睡期間，迅速將公寓傢俱、設備與服飾全部汰換成西德時髦商品的原因。換言之，她的角色反映了德東人陷入西德商品消費熱的認知模式。相較而言，克莉絲汀和亞力士則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在《再見列寧》中常看到克莉絲汀草擬抗議商品瑕疵、單調或缺少選擇性的申訴書，雖是抱怨，但從詼諧的語言看來，其中隱含了在社會主義體制內改革的姿態。這樣的姿態

¹⁴⁰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5.

¹⁴¹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5; Daphne Berdahl, "Go, Trabi Go!," 61-62;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39-740.

¹⁴²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3-194; Robert Darnton, *Berlin Journal*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1), 155.

¹⁴³ 學者稱《再見列寧》再現了東德人統一之初的西德商品消費熱到「懷舊東德」的兩種態度與意義之認知，但本文進一步提出第三種模式。參閱Oana Godeanu-Kenworthy, "Deconstructing Ostalgia: The National Past between Commodity and Simulacrum in Wolfgang Becker's Good Bye Lenin! (2003),"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41 (May 2011), 166-167.

也表現在當亞力士表示預訂的拖笨車已可交貨時，克莉絲汀還戲謔地說「才等了三年」。亞力士透過東德「文化記憶」媒介建構其「東德」空間，則體現了「懷舊東德」風潮中德東人積極尋找與消費東德商品的態度。《再見列寧》同時表現三種德東人對東德商品的認知態度，再現了兩德統一後德東人從西德商品消費熱到「懷舊東德」風尚的激烈變遷。

《再見列寧》所呈現的東德商品意義的變遷，正是東德消費文化發展的具體化成果。在兩德統一之初投入西德商品消費的德東人，經歷各方面失落感，逐漸出現「懷舊東德」情懷。一個東德婦女描述了此一心路歷程：

在柏林圍牆倒塌後，我們都深陷西方商品之中……最初幾個月，我就增加了2磅，我嚐遍每一種巧克力棒，例如Toblerone和Rittersport等……還有好吃的大蛋糕捲。但後來我瞭解到它們都是用空氣製造的，我們要我們的東德蛋糕捲回來。我們的Spee洗衣劑、我們的芥末……我們都一直尋找直到找到這些東西。東德產品已經回來了。¹⁴⁴

於是，德東人開始回歸東德商品消費。如前文所述，許多東德婦女開始重新穿上原本被認為不夠現代的工作服，因為它們象徵社會主義時期的勞動女性與價值。年輕人開始喝維他可樂或東德啤酒。原本象徵落後的拖笨車，也被當成突顯東德人認同的指標。例如，有人選擇駕駛拖笨車，而非新買的歐寶(Opel)，去和西德親戚聚餐，甚至表示：「我們開著拖笨車，並把它停在他們那六萬八千馬克的賓士旁邊。」¹⁴⁵此一消費態度的轉向，具現東德商品意義的改變。原本受到輕蔑而棄置街頭的東德商品，反而成為標示德東社群認同、甚至引以為傲的「文化記憶」媒介。如《再見列寧》所再現，德東人統一後再度消費諸如斯博特醃瓜、金摩卡咖啡、卡達卡紅酒等商品。

在轉向「懷舊東德」消費風下，還出現強調商品德東在地性的賣場。例如，「萊比錫消費」(Konsum Leipzig)連鎖超市，特意強調其銷售商品都屬德東製造，諸如「我們來自德東五邦」、「我們的推薦：購買這裡(德東五邦)

¹⁴⁴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201.

¹⁴⁵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7.

生產的商品」等口號。¹⁴⁶強調產品在地性之外，其行銷策略更訴諸商品和德東社群認同的連結。例如，在廣告文案中時常出現，「我們堅持一起在『萊比錫消費』購物」、「『萊比錫』是我們的一員」、「『萊比錫消費』是我們認同的一部分，我們以此為傲」等內容。部分廣告文案甚至訴諸悲情，凸顯東德在統一歷程中的被害角色：「以『萊比錫消費』的賣場優先，畢竟很多[其他東德賣場]已被消滅了。」¹⁴⁷「萊比錫消費」的執行長在解釋消費者動機時，更簡潔有力地指出消費東德商品和德東人社群認同之間的關係：「基於失望、基於驕傲、基於定義、基於與西德劃清界線，最後最重要的是，基於記憶。這些東德商品曾在市場上，後來消失了，之後它們突然又回來了……。」¹⁴⁸換言之，由於對統一結果的失望，對德東製品的驕傲、基於德東社群呈現和西德之間差別的心態，德東人回歸東德商品消費。於是，這些東德商品，也成為記憶東德的物質性媒介。

有趣的是，東德商品消費不僅成為記憶社會主義德國的「文化記憶」媒介，其商品本身的特徵，也構成德東人東德記憶的物質性基礎。亦即，1960年代以來缺乏變化的特性，反而使東德商品成為跨世代的「文化記憶」媒介。¹⁴⁹換言之，在統一後嶄新的社會脈絡下，東德商品一成不變的物質性，反而成為東德日常生活的「文化記憶」乘載物。例如，在Nudossi公司網站留言板中，許多訪客積極鼓勵讀者購買東德商品，經常強調它們可以喚回已消失的東德記憶與價值，其中一個訪客便指出：「我認為我們應堅持我們的舊價值觀，而東德商品永遠是最好的。」¹⁵⁰什麼價值觀呢？許多口述歷史研究顯示，東德人自我認同與價值的形成，與勞動生產的意識形態有密切關係。¹⁵¹昔日以勞動生產為核心價值、以勞動場所為社會生活中心

¹⁴⁶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200.

¹⁴⁷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200.

¹⁴⁸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200.

¹⁴⁹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54.

¹⁵⁰ Anonymous, "More than 'Ostalgie'—East German-era Goods Also a Hit in the West," *German Business Review* (August 2007), 4.

¹⁵¹ 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52;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的經驗，讓面臨高失業率的德東人產生失落感，因而回想起他們統一之前有工作的穩定生活。正如一個萊比錫鋼樑工人曾表示：「我無法告訴你，對我來說我勞動生產的產品在『轉折』之後就消失，有多痛苦。」¹⁵²如此生活不穩定的焦慮，也表達在一位萊比錫婦女的心聲：「失業對我們的存在而言是壞事。我們全部被教養成社會主義者，我們也被教導工作是人類有別於動物之處。這是我們以前所學。我們無法想像突然失去工作。」¹⁵³換言之，「懷舊東德」的出現，置於德東去工業化的脈絡下檢視，顯示德東人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悼念與憧憬，以及他們在統一後失去勞動身份認同的失落。

其次，德東人對東德商品的共享經驗，也成為他們在統一後建構身份認同的物質性基礎。由於東德日常生活產品的製造、包裝與行銷，幾乎一致、不具多樣性與選擇性情況下，消費者必須以使用產品的實際經驗來辨識商品，形成產品認同。此一產品使用經驗所共享的產品知識，或者「產品傳記」(product biographies)¹⁵⁴，成為以德東消費者為主體的想像共同體基礎。¹⁵⁵換言之，脫離東德經濟落後的原始脈絡，東德商品本身的特性，在德東人集體失落的社會脈絡下，反而成為他們回歸過去的物質性基礎，因所有經歷東德消費文化的德東人，都具有象徵過去之商品的共享記憶。

於是，東德商品的意義，在新德國資本主義體制下產生了變化，成為具體化東德日常生活的「文化記憶」媒介，可茲建構失落德東人的群體認同。被賦予新意義的東德商品，成為對抗新德國官方強勢統一政策、抵制資本主義消費文化、書寫另類東德歷史論述的空間，成為建構德東人認同的基礎。值得注意，從歷史記憶的角度言，因社群對過去意義的認知，隨著現在脈絡的需求，而重新定義，有所改變，而此一意義重新建構的現在

Present.," 193-194.

¹⁵²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8.

¹⁵³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198-199.

¹⁵⁴ Martin Blum, "Remaking the East German Past," 235.

¹⁵⁵ Oana Godeanu-Kenworthy, "Deconstructing Ostalgia," 173-174; Martin Blum, "Remaking the East German Past," 233-235.

取向，進一步突顯德東人「懷舊東德」情結所表現的選擇性記憶與遺忘：藉由消費東德商品，選擇性記憶了社會主義時期日常生活經驗，同時也選擇性遺忘了「統一社會黨」與「國家安全部」的黨國暴力與不義。如此，才能合理解釋，昔日「可悲的日子」(bad old days)如何轉義為「黃金年代」。這樣的選擇性記憶與遺忘傾向，甚至造成德東人為東德辯護的傾向。例如，2009年6月《明鏡週刊》(*Der Spiegel*)刊載的一項民調分析指出，百分之49的德東人認為「東德好的方面比壞的方面更多，雖有些問題，但那裡(東德)的生活很好」。其中，甚有百分之8德東人認為「東德幾乎各方面都好，那時的生活比現在統一的德國更好、更快樂」。¹⁵⁶換言之，「懷舊東德」可說是選擇性記憶與遺忘的結果。

綜上所述，「懷舊東德」歷史脈絡的追溯，一方面呈現東德商品在不同社會脈絡下意義變遷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突顯事物隨時代變遷，具體化選擇性記憶和遺忘過去的功能。正是在此意義上，「懷舊東德」及其文化生產品的《再見列寧》，成為探究德東人在新德國的「懷舊東德」及其商品化歷程，以及檢視兩德統一後德國國族認同建構危機狀態的「文化記憶」媒介。

七、結論：本是同根生，成長難分離？

本文立基「文化記憶」分析取徑，檢視《再見列寧》及其再現之「懷舊東德」的多重意義，從中解答「懷舊東德」的歷史脈絡因素，指出「懷舊東德」以東德商品與物質文化消費為表現形式的「文化記憶」基礎。就歷史記憶研究的學理性意義而言，《再見列寧》展示了個人與群體記憶和認同建構的社會性、物質性、儀式性與空間性。藉此分析視角，本文得以論證「懷舊東德」與《再見列寧》，如何構成寄託東德懷舊情懷的「記憶所繫之處」，成為德東人建構其社群認同的社會性空間。就此而言，歷史記憶研究取徑之運用，對臺灣影視史學、應用史學的研究與教學，具重要意義。

本文在「文化記憶」此一分析框架下，具體觀察兩德統一後，德東人

¹⁵⁶ Julia Bonstein, "Heimweh nach der Diktatur" *Der Spiegel* 27, (June 29, 2009),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65872415.html>, accessed on April 30, 2014.

從西德商品消費熱，一直到東德商品消費熱的激烈轉折，從中檢視其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脈絡因素，論證上述現象如何視覺化於《再見列寧》的「文化記憶」媒介之中。本文已呈現，兩德統一歷程中見諸各領域去東德化所導致的困境與挫敗，並非德東社群「懷舊東德」的唯一因素。在「轉折」劇變之後，新德國國史書寫選擇性強調東德黨國機器暴力，造成東德史的「去合法化」，以及東德日常生活史的邊緣化，使德東社群在歷史情感與記憶上，均受傷害，不但形成與西德佬之間的無形柏林圍牆，產生「二等公民」的自我認知，最終興起渴望回歸東德穩定生活的憧憬。在此情況下，到2004年6月，仍有評論者指出「在我們的歷史記憶中，德國還是一直分裂着」。¹⁵⁷是故，德東人只好寄情「懷舊東德」，藉東德商品消費，建構其德東社群認同。本文認為，「懷舊東德」商品化，是西德主導的強勢統一政策，與選擇性國史書寫暴力下，造成德東人「歷史情感之傷」的必然結果。

「文化記憶」分析概念之運用，讓本文得以《再見列寧》為中心，從事物生命史與東德消費文化的角度，探究「懷舊東德」的物質記憶基礎，並呈現此一懷舊商品化背後所隱含之選擇性記憶與遺忘和認同建構的辯證關係。具體而言，德東人在兩德統一初期西德商品熱中，表現出對東德商品的負面認知，卻在1990年代中期突然逆轉，形成正面認知。如本文所示，此一東德商品意義與德東人認知態度的變化，也再現於《再見列寧》中主要角色對東德商品的三種態度之上。經歷此一變遷，原本具體化「可悲的日子」的東德商品，反而成為寄託東德「黃金年代」的「文化媒介」，甚而構成德東社群認同的「文化記憶」物質基礎。有趣的是，東德商品一成不變的缺陷或特徵，反而構成東德商品得以轉化為「懷舊東德」之「文化記憶」媒介的物質基礎，並體現德東人對於東德日常生活的選擇性記憶，以及對黨國機器不義之行的選擇性遺忘。記憶與遺忘乃一體兩面，是社會與權力結構變遷的產物，必須獲得社群間彼此尊重與承認，才能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建構多元歷史認知的和諧社會。

由歷史記憶研究視角的詮釋，使本文得以論證《再現列寧》具體表現了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的危機狀態。從1989年10月10日西德前總理布蘭特

¹⁵⁷ 陳延輝，〈德國人國家認同的建構〉，頁111。

高喊「本是同根生，成長難分離」，至兩德統一24週年前夕新德國國家隊奪得世足冠軍，德國內在統一性之建構貌似完成。但實際上，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的進展、危機與挑戰，猶待長期觀察。不論是東德佬與西德佬之間的心牆隔閡，或者「懷舊東德」風潮中德東人的另類社群認同建構，都顯示「本是同根生，成長難分離」的理想，不是理所當然。例如，1997年10月3日正值兩德統一七週年紀念，德東人反而以諸如「東德周」、「東德趴」(Ossi partys)、「東德節慶」(Ostivals)、穿著少年先鋒隊與工人民兵隊(Kampfgruppe)制服等反紀念形式，重溫昔日「黃金年代」的生活，抒發對東德的憧憬。¹⁵⁸此一新德國國族認同「不統一」的狀態，至《再見列寧》攝製時，仍然持續。2002年9月，在德國哈雷(Halle)舉辦的德國歷史學會上，德國總統勞(Johannes Rau, 1931-2006)仍需大力呼籲，歷史學家應致力於得以促進德國國族認同的國史書寫，高喊「沒有歷史，認同之不可能，沒有歷史則沒有認同。」¹⁵⁹此一呼籲本身，具體透露，德國在21世紀初，仍處於國族認同建構的危機狀態。

如本文已呈現，新德國國族認同的危機狀態的持續惡化，具體展現於德國社會中所形成的東德佬與西德佬間的衝突與分野，而兩社群之間也形同豎起一道無形的「柏林圍牆」。甚且，基於對民主體制的不解、統一經歷的失落，德東人對於新德國的認同比例，較德西人低很多。¹⁶⁰換言之，統一後的德國社會，確實存在着分裂的德東人認同，而且是在東德以新德東五邦名義併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後，方才逐漸形成。

本文認為德東人自我認同的模式，是介於東德公民與新德國公民之間的第三種認同形式。亦即，兩德統一後，隨著東德政權的消亡，他們不可能再是東德公民，而他們在統一歷程中產生的失落感，以及「我們沒有離開家，卻已經移民」的「二等公民」認知，也讓他們無法「適所」地融入

¹⁵⁸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202.

¹⁵⁹ 轉引自 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since 1800*, xiii.

¹⁶⁰ Thomas Blank and Peter Schmidt, "National Identity in A Unified Germany: Nationalism or Patriotism? An Empirical Test with Representative Data," *Political Psychology*, 24: 2(2003), 299.

新德國公民身份，因而採取一種以東德商品與物質文化消費為基礎的德東認同模式。雖2013年8月《明鏡週刊》刊載一文指涉，在德國總理與總統，均來自德東地區的狀況下，近年來德東人認同已悄然消失。但這種看法似乎過於樂觀，仍猶待觀察。¹⁶¹而且，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的障礙，除了德東人與德西人的社群認同衝突因素之外，德國作為一個多族群移民社會的移民政策變遷、德國人與土耳其人之間的衝突、新右派種族主義式的國族論述，以及對外的歐盟認同等，皆是建構德國國族認同的變數，因篇幅所限，無法具體討論，需另文處理。¹⁶²

統一後世代的德東認同取向仍值得再觀察，或將隨時遞減，或不可能完全消失，因群體記憶建與認同形塑，可透過「溝通記憶」或「文化記憶」媒介進行跨世代傳遞與複製。根據觀察，兩德統一第一代德東人通常表現出分離主義認同模式，第二代則呈現同化認同模式，第三代則經常再次回歸德東認同模式。¹⁶³就此而言，《再見列寧》除了一方面展現德東人面對兩德統一的各種態度與觀點，具體再現「懷舊東德」中德東社群認同建構的趨勢之外，另一方面也以亞力士與德西同事的合作、亞力士姐姐與韓納結合之後孕育的統一寶寶等情節，表達了對新德國統一與國族認同建構的樂觀展望。類似的樂觀態度，也表現在女主角薩斯的期待：「應該看看《再見列寧》中來自德東與德西的演員，如何訴說一個有關『我們』歷史的故事，或許我們終將成功把兩德分治時代拋諸腦後。」¹⁶⁴至於《再見列寧》所反映的西德觀點、懷舊西德現象，以及西德人投入東德與西德懷舊文化產業

¹⁶¹ Stefan Berg, "Abschied vom Ossi," *Der Spiegel* 35 (August 26, 2013),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108794779.html>, accessed on April 30, 2014; 根據陳延輝，德東人梅克爾(Angela Merkel, b. 1954)自2005年11月擔任德國總理以來，對於德東人的德國認同感有所幫助，參閱陳延輝，〈德國人國家認同〉，頁111。

¹⁶² 相關議題可參閱 Andreas Huyssen, *Twilight Memories*, 74-78; Czarina Wilpert, "Identity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ostwar Migration from Turkey to Germany," 108-131; 陳延輝，〈德國人國家認同的建構〉，頁106-112。

¹⁶³ Toralf Staud, "Ossis Sind Türken: In Gesamt-Westdeutschland sind die Ostdeutschen Einwanderer," 9; Andreas Böhn, "Memory, Musealization and Alternative History in Michael Kleeberg's Novel *Ein Garten in Norden* and Wolfgang Becker's Film *Good Bye, Lenin!*," 256-257.

¹⁶⁴ Daphne Berdahl, "Goodbye Lenin, Aufwiedersehen GDR," 129.

的原因與意義，需另文探討。

本文認為，或許「懷舊東德」風潮僅限戰後兩德分治成長世代，但若德東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結構性邊緣化持續，則「懷舊東德」現象及其「文化記憶」則可能進行跨世代傳遞，成為一個持續性的社會實踐。四十年兩德分治，造成德東與德西人在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價值觀與歷史記憶的差異與隔閡，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仍處於危機狀態。「本是同根生，成長難分離」雖寓意美好，但並非理所當然。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中文專書

- Astrid Erll編，余傳玲等譯，《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Astrid Erll, bian, Yu, Chuanling, deng yi. *Wen hua ji yi li lun du ben*, Beijing, Beijing da xue chu ban she, 2012.
- 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2012。
Pierre Nora, bian, Dai, Lijuan, yi. *Ji yi suo ji zhi chu*, Taipei: Xing ren, 2012.
- 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先覺出版社，2016。
Hua, Yifen. *Zai li shi de shang kou shang zhong sheng: Deguo zou guo de zhuan xing zheng yi zhi lu*. Taipei: Xian jiao chu ban she, 2016.
- 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2012。
Xiao, Aqin. *Zhong gou Taiwan: Dang dai min zu zhu yi de wen hua zheng zhi*, Taipei: Lian jing, 2012.

(二) 西文專書

- Appadurai, Arjun,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Toward the Historikerstreit of the Mid-1980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Baram, Uzi and Rowan, Yorke M., ed. *Marketing Heritage: Archaeolog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ast*, California: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2004.
- Berger, Stefan.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since 1800*,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7.
- Cooke, Paul. *Representing East Germany since Unification: From Colonization to Nostalgia*, New York: Berg, 2005.
- Connerton, Paul.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Cresswell, Tim.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Socio Publishing Co., 2006.
- Darnton, Robert. *Berlin Journal*,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1.
- Eger, Christian. *Mein kurzer Sommer der Ostalgie: Ein Abspann*, Düsseldorf: Janos

- Stekovics, 2004.
- Fulbrook, Mary.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Fraser, Catherine C. and Hoffmann, Dierk O. *Pop Culture Germany! Media, Arts, and Lifestyle*, Oxford: ABC Clio, 2006.
- Frey, Mattias. *Postwall German Cinema: History, Film History and Cinephilia*, Oxford: Berghahn, 2013.
- Huysen, Andreas. *Twilight Memories: Mar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Illies, Florian. *Generation Golf*, Berlin: Argon, 2000.
- Jeffrey Herf, 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Konrad H. Jarausch and Michael Geyer, *Shattered Past: Reconstructing German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Ladd, Brian, *The Ghosts of Berlin: Confronting German History in the Urban Landsca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 Lange, Thomas and Geoffrey Pugh. *The Economics of German Un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1998.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 Logan, William and Revves, Keir, ed. *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Dealing with 'Difficult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Macdonald, Sharon.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McAdamas, A. James. *Judging the Past in Unified Germa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Müller, Peter. *Symbol mit Aussicht, Der Berliner Fernsehturm*, Berlin: Verlag Bauwesen, 2000.
- O'Brien, Mary-Elizabeth. *Post-Wall German Cinema and 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12.
- Robert von Hallberg, ed. *Literary Intellectual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ate: Professionalism and Conformity in the GD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Torpey, John. *Intellectuals, Socialism and Dissent: The East German Opposition and Its Legac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Verheyen, Dirk. *United City, Divided Memories?: Cold War Legacies in Contemporary Berlin*,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8.

(三) 西文期刊或專書論文

- Anonymous. "More than 'Ostalgie'—East German-era Goods Also a Hit in the West," *German Business Review*, (August 2007), 4-5.
- Assmann, Jan, and John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65 (1995): 125-133.
- Assmann, Jan. "Introduction: What is Cultural Memory," in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 Ten Stud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0.
- Barney, Timothy. "When We Was Red: Good Bye Lenin! And Nostalgia for the 'Everyday GDR',"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6: 2 (June 2009), 132-151.
- Berdahl, Daphne.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Memory, Longing, and the East German Things," *Ethnos*, 64:2 (1999), 192-211.
- Berdahl, Daphne. "Goodbye Lenin, Aufwiedersehen GDR: On the Social Life of Socialism," in Daphne Berdahl, *On the Social Life of Postsocialism*, Martin Bunzi,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3-134.
- Betts, Paul.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East German Mem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2: 3 (Sept. 2000), 731-765.
- Betts, Paul. "Remembrance of Thing Past: Nostalgia in West and East Germany, 1980-2000," in Paul Betts and Greg Eghigian, eds. *Pain and Prosperity: Reconsidering Twentieth-Century Germ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8-207.
- Blum, Martin. "Remaking the East German Past: Ostalgie, Identity, and Material Cultur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34: 3 (Winter 2000), 229-253.
- Böhn, Andreas. "Memory, Musealization and Alternative History in Michael Kleeberg's Novel *Ein Garten in Norden* and Wolfgang Becker's Film *Good Bye, Lenin!*," in Silke Arnold-de Simone, ed. *Memory Trac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5, 245-260.
- Calhoun, N. and Duckenfield, M.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Ampelmännchen," *German Politics*, 6:3 (1997), 54-69.
- Confino, Alon. "Consumer Culture is in Need of Attention," in Scott Denham, Irene Kacandes, and Ionathan Petropoulos, ed. *A User's Guide to German Cultural*

- Stud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 181-188.
- Cook, Roger F., "Good Bye, Lenin!: Free-Market Nostalgia for Socialist Consumerism," *A Journal of Germanic Studies*, 43: 2 (2007), 206-219.
- Cook, Roger F. "Nostalgic Travels through Space and Time: Good Bye, Lenin," in Christina Lee, ed. *Violating Time: History, Memory, and Nostalgia in Cinema*,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70-87.
- Creech, Jennifer. "A Few Good Men: Gender, Ideology,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The Lives of Others and Good Bye, Lenin!," *Women in German Yearbook*, 25 (2009), 100-126.
- Downing, Crystal. "Staging Ideology and Love in Good Bye, Lenin!," *Film and History*, 43: 2 (Fall 2013), 5-16.
- Godeanu-Kenworthy, Oana. "Deconstructing Ostalgia: The National Past between Commodity and Simulacrum in Wolfgang Becker's Good Bye Lenin! (2003),"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41 (May 2011), 161-177.
- Halbwachs, Maurice. "Historic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Francisi J. Ditter and Uida Yazdi Ditter, Jr., New York: Happer & Row, [1950] 1980, 50-87.
- Halbwachs, Maurice. "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 1992, 35-189.
- Hell, Julia Hell and von Moltke, Johannes. "Unification Effects: Imaginary Landscapes of the Berlin Republic," *Germanic Review*, 80:1 (Winter 2005), 74-95.
- Henizelmann, Ursula. "Spreewälder Gurken: Pickled Cucumbers from the Spreewald," *Gastronomica: The Journal of Food and Culture*, 4: 3 (2004), 13-17.
- Hobsbawm, Eric.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4.
- Hogwood, Patricia. "Identity in the Former GDR: Expression of 'Ostalgia' and 'Ossi' Pride in United Germany," in Paul Kennedy, ed.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Crisis or Opportunity*, New York: Palgrave, 2001, 64-79.
- Jozwiak, Joseph F. and Elisabeth Mermann. "'The Wall in Our Minds?' Colonization, Integration, and Nostalgia,"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39: 5 (2006), 780-795.
- Kapczynski, Jennifer M. "Negotiating Nostalgia: The GDR Past in Berlin Is in Germany and Good Bye, Lenin!," *The Germanic Review: Literature, Culture, Theory*, 82:1 (2007), 78-100.
- Littlejohn, John T. and Putnam, Michael T. "Rammstein and Ostalgie: Longing for

- Yesteryear," *Popular Music and Society*, 33: 1 (Feb. 2010), 35-44.
- Nora, Pierre.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7-24.
- Ploman, Andrew. "Westalgie? Nostalgia for the 'Old' Federal Republic in Recent German Prose," *Seminar: A Journal of Germanic Studies*, 40:3 (2004), 249-261.
- Page, Edward and Richard Rose. "German Responses to Regime Change: Culture, Class, economy or contex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 1 (1996), 1-27.
- Schmidt, Peter, and Thomas, Blank. "National Identity in A Unified Germany: Nationalism or Patriotism? An Empirical Test with Representative Data," *Political Psychology*, 24: 2 (2003), 289-312.
- Simine, Silke Arnold. "Themepark GDR?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Memory in post-Wende Museum, Literature and Films," in Christian Emded and David Midgley, eds. *The Fragile Tradition: The German Cultural Imagination since 1500. I: Cultural Mem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xford: Peter Lang, 2004, 253-277.
- Staud, Toralf. "Ossis Sind Türken: In Gesamt-Westdeutschland sind die Ostdeutschen Einwanderer," *Die Zeit*, 41 (October 2003), 9.
- Till, Karen. "Places of Memory," in J. Agnew, K. Mitchell, G. O'Tuathail, ed.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2003, 289-301.
- Till, Karen. "Post-Totalitarian Identity: Public Memory in Germany and Russia," with Benjamin Forest and Juliet Johnso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35 (Fall 2004), 357-380.
- Uecker, Matthias. "Fractured Families-United Countries? Family, Nostalgia and Nation-Building in Das Wunder von Bern and Goodbye Lenin!," *New Cinema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Film*, 5: 3 (2007), 189-200.
- Von Festenberg, Nikolaus. "Sandmännchen rettet die DDR: Wolfgang Beckers wunderbare Kinophantasie 'Good Bye, Lenin!' wehrt sich mit viel Ironie gegen den underbittlichen Lauf der Geschichte," *Der Spiegel*, 6 (Feb. 2003), 120.
- Wilpert, Czarina. "Identity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ostwar Migration from Turkey to Germany,"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31: 2 (Summer 2013), 108-131.
- Willy Brandt, "Speeches at the Schöneberg City Hall in West Berlin," in *German Unific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Richard T. Gray and Sabine Wilke, e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61-69.

(四) 中文期刊或專著論文

王志弘，〈臺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2(臺北，1996.04)，頁195-218。

Wang, Zhihong. "Taipei xin gong yuan de qing yu di li xue: Kong jian zai xian yu nan tong xing lian ren tong," *Taiwan she hui yan jiu ji kan*, 22(Taipei, 1996.04), 195-218.

王甫昌，〈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的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第8卷第2期(臺北，2001.12)，頁145-208。

Wang, Fuchang, "Min zu xiang xiang, zu qun yi shi yu li shi: 'Ren shi Taiwan' jiao ke shu de zheng yi feng bo de nei rong yu mai luo fen xi," *Taiwan shi yan jiu*, di 8 juan di 2qi (Taipei, 2001.12), 145-208.

周惠民，〈德國現代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臺北，2006.11)，頁233-257。

Zhou, Huimin. "Deguo xian dai shi lun shu zhong de ji ge zheng yi ji xiu zheng," *Guo li Zheng zhi da xue li shi xue bao*, di 26 qi (Taipei, 2006.11), 233-257.

陳延輝，〈德國人國家認同的建構〉，《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2卷第3期(臺北，2006.09)，頁91-186。

Chen, Yanhui. "Deguo ren guo jia ren tong de jian gou," *Taiwan guo ji yan jiu ji kan*, di 2 juan di 3 qi (Taipei, 2006.09), 91-186.

萬靜波，〈沃爾夫岡·貝克《再見列寧》怎樣拍成〉，《南方人物周刊》，第45期(廣州，2009.11)，頁72-74。

Wan, Jingbo. "Wo er fu gang•Bei ke 'Zai jian lie ning' zen yang pai cheng" *Nan fang ren wu zhou kan*, di 45 qi (Quangzhou, 2009.11), 72-74.

潘宗億，〈全球首都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以北京天安門廣場與柏林「浩劫紀念碑」為中心的探討〉，收於梁景和主編，《社會文化史理論與方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104-144。

Pan, Zongyi. "Quan qiu shou dou guo zu ji yi kong jian zhi jian gou : yi bei jing tian an men guang chang yu bai lin 'Hao jie ji nian bei' wei zhong xin de tan tao," shou yu Liang, Jinghe, zhu bian." *She hui wen hua shi li lun yu fang fa*(Beijing: She hui ke xue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4), 104-144.

潘宗億，〈浮現北京城的時間中軸線：中國首都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及其意義變遷〉，《近代物質文化研究：第一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4)，頁347-402。

Pan, Zongyi. "Fu xian Beijing cheng de shi jian zhong zhou xian: Zhong guo shou

dou guo zu ji yi kong jian zhi jian gou ji qi yi yi bian qian,” *Jin dai wu zhi wen hua yan jiu: Di yi jie li shi yu wen wu xue shu yan tao hui* (Taizhong: Feng jia da xue li shi yu wen wu yan jiu suo, 2014), 347-402.

潘宗億，〈瑪德萊娜時刻：以戰後臺灣飲食書寫中的食物記憶為例〉，《中國飲食文化》，第12卷第1期(臺北，2016.04)，頁91-176。

Pan, Zongyi. “Ma de lai na shi ke: Yi zhan hou Taiwan yin shi shu xie zhong de shi wu ji yi wei li,” *Zhongguo yin shi wei hua*, di 12 juan di 1 qi (Taipei, 2016.04), 91-176.

(五) 網路資料

- Anke Westphal, “Was unterging, taucht nicht mehr auf: Good bye, Lenin! von Wolfgang Becker legt heiter Distanz ein—das macht traurig,” *Berliner Zeitung*, 8 Feb. 2003, <http://www.berliner-zeitung.de/archiv/-good-bye--lenin---von-wolfgang-becker-leg-t-heiter-distanz-ein---das-macht-traurig-was-unterging--taucht-nicht-mehr-auf,10810590,10063318.html>, accessed on April 16, 2015;
- Evlyn Finger, “Die unsinkbare Republik: Wolfgang Beckers Tragikomödie Good Bye, Lenin! kennt viele Arten von Gelächter,” *Die Zeit*, 6 Feb. 2003.
- “Good Bye Lenin! Jetzt, iM KiNO,” <http://www.79qmddr.de/index2.php>, accessed July 17, 2014.
- “Good Bye Lenin! sweeps Europe Film Awards,” <http://www.smh.com.au/articles/2003/12/07/1070732064859.html>, accessed on July 17, 2014.
- “Good Bye, Lenin: Hello Humor,” *Deutsche Welle*, 23 July 2003, <http://www.dw.de/goodbye-lenin-hello-humor/a-800319>, accessed on April 19, 2015.
- “Interview: Good Bye, Lenin,” *AlloCiné*, 9 September 2003, http://www.allocine.fr/article/fichearticle_gen_article=18357517.html, accessed on April 17, 2009.
- “Interview mit Autor Bernd Lichtenberg,” <http://www.good-bye-lenin.de/int-licht.php>,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5.
- “Interview mit Daniel Brühl,” <http://www.good-bye-lenin.de/int-bruehl.php>, accessed on April 19, 2015.
- “Interview mit Katia Saß,” <http://www.79qmddr.de/int-sass.php>, accessed on April 19, 2015.
- Jakob Buhre, “Wolfgang Becker,” *Planet Interview*, 19 January 2003, <http://www.planet-interview.de/interviews/wolfgang-becker/33649/>,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5.

- Julia Bonstein, "Heimweh nach der Diktatur" *Der Spiegel*, 27 (June 29, 2009),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65872415.html>, accessed on April 30, 2014.
- "Ostalgie: Ganz Deutschland lacht und weint über den Film 'Good bye, Lenin!'," *Stern*,
23 November 2003,
<http://www.stern.de/panorama/ostalgie-ganz-deutschland-lacht-und-weint-ueber-de-n-film-good-bye-lenin-516162.html>, accessed on April 19, 2015.
- Patricia Thomson, "Good Bye, Lenin: Hello, Wolfgang Becker," *Indiewire*, 9 August
2004, http://www.indiewire.com/article/goodbye_lenin_hello_wolfgang_becker,
accessed on April 19, 2015.
- Stefan Berg, "Abschied vom Ossi," *Der Spiegel* 35 (August 26, 2013),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108794779.html>, accessed on April 30, 2014
- Stephen Applebaum, "Wolfgang Becker: Good Bye, Lenin,"
[http://www.bbc.co.uk/films/2003/07/16/wolfgang_becker_good_bye_lenin_intervie
w.shtml](http://www.bbc.co.uk/films/2003/07/16/wolfgang_becker_good_bye_lenin_interview.shtml),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5
- 方清月, 〈經濟又好轉, 德東人大舉回流〉, 《看雜誌》, 113(May 24, 2012),
<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2/4309>, accessed on April 15th, 2014.
- Fang, QingYue, "Jing ji you hao zhuan, De dong ren da ju hui liu," *Kan za zhi*, 113
(May 24, 2012),
<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2/4309>, accessed on April 15th, 2014.
- "Wolfgang Becker: Nach 'Good bye, Lenin!' auf einmal der Grandmaster der Ostalg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April 2004,
[http://www.faz.net/aktuell/feuilleton/wolfgang-becker-nach-good-bye-lenin-auf-ein
mal-der-grandmaster-der-ostalgie-1143407-p2.html](http://www.faz.net/aktuell/feuilleton/wolfgang-becker-nach-good-bye-lenin-auf-ein-mal-der-grandmaster-der-ostalgie-1143407-p2.html), accessed on April 17, 2015.
- "Wolfgang Becker: Portrait" <http://www.kino.de/star/wolfgang-becker/89826>. accessed
on April 19, 2003.
- Peter Zelma, "Wider den Ostalgie-Verdacht: Good Bye, Lenin!—Ein Interview mit
Wolfgang
Becker," *Fluter*, 13 February 2003, <http://film.fluter.de/de/14/kino/1576/>, accessed on
April 19, 2015.

Good Bye Lenin: “Ostalgie” and the Crisi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New Germany

Pan, Tsung-Y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aims to interpret the movie *Good Bye Lenin!* and examin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Ostalgie,” or East German nostalgia, that the movie repres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terial culture, cultural memory, and social production of space. In addition to looking into the larger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which the fashion of “Ostalgie” emerged, it intends to explore how it has been the “spatial” foundation for certain East Germans to construct an alternative identity in the New Germany by consuming the material manifest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over East Germany. Based 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vie in the first part,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case study of a historical film to illuminate the social, ritual, material, and spati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identity. Moreover, by defining the movie as a realm of memory, or media of cultural memory, of East Germany and “Ostalgi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nsumption, re-creation, reenactment of material culture inherited from East Germany have been used by East Germans to create an imaginative, social space to construct an alternative form of collective identity.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moves on to examine the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emergence of “Ostalgie” and argues that it was also the consequence of the violence of the unification policy de-legitimizing East Germany and of the selective writing of new national history. In other words, those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rust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East Germans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two Germanys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trauma caused by the official discourse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New Germany altogether led to East Germans' self-identification of second-class citizens who "have migrated without leaving home" and to the crisis of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Finall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how "Ostalgie" was manifested in the form of consuming products of daily life in the period of East German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cultural memory.

As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Good Bye Lenin!, this article can contribute to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historiophoty and public/applied history by demonstrating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films. Moreover, using analytical concepts of material culture, cultural memory, and social production of space, this article shows the possibility to studying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memory making by analyzing "Ostalgi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nostalgia and collective consumption of certain past by certain social groups.

Keywords: Good Bye Lenin, Ostalgie,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Memory, Production of Space

